

# 遷移、挫折與現代性： 蘭嶼達悟人精神失序受苦的社會根源

蔡友月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本文目的，以社會受苦概念探討蘭嶼達悟人的遷移經驗與高比例精神失序的關係，並藉此反省九〇年代之後，基因研究取徑與原住民健康議題之間選擇性親近的關係之限制。主要分析的對象，為晚近達悟人精神失序發病所集中的 25 到 60 歲之間的青、壯世代。本文認為：要理解達悟人晚近廣泛而獨特的精神失序現象，不能簡單地訴諸單一因素，譬如生物醫學方面的基因解釋。因此本研究強調深入田野，接近達悟人的生活世界與日常經驗，同時輔以各種文獻資料，釐清長久的歷史處境與當代命運的關連。本文同時也指出：蘭嶼衛生所登記精神失序的個案中，半數以上首度出現不正常徵兆的地點，都是在台灣本島。達悟青、壯人口被迫來往遷移於蘭嶼與本島之間謀求生計，是這個離島少數族群某種集體的社會「脫序」(anomie)重要面向。這種原本與外界相當隔絕而孤立的少數族群的社會脫序，是無可選擇地被捲入現代社會的歷史發展結果。在平均年齡 15、16 歲隻身離開原鄉、沒有父母陪伴下來到以漢人為主的台灣社會求學工作的艱辛過程中，他們所遭受的種種困境與挫折，與流行於他們這個世代的高比例精神失序之間，有極密切的關係。這個世代由於遷移經驗而來的身心創傷，來自開始接受現代教育所必須面對的共同命運，超越了個別成員各自不同的個人遭遇。原鄉蘭嶼經歷快速的社會變遷，迫使達悟人離鄉背井以謀生計，而他們的特殊歷史經驗與文化傳統，則形塑、甚至加深青、壯世代在遷移台灣過程中的困境與創傷，因而誘發了高比例的精神失序現象。

關鍵詞：基因、達悟人、遷移、社會受苦、精神失序

## Migration, Mental Frustration, and Modernity: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Mental Disorders of the Tao Aboriginal People on Taiwan's Orchid Island

Yu-Yueh Tsa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uffering, the paper explor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igration experience of the Tao aboriginal people on Taiwan's Orchid Island and their mental disorders. It examines the limits of the genetic approach to aboriginal health based on the biomedical model of medicine after the 1990s. The focus of the study is on the cases of mental disorder of young and adult generations, ranging from 25- to 60-year-old population. I argue that the prevalence of mental disorders among the Taos cannot be explained by any single factor, such as a genetic disorder. My fieldwork and a variety of documentation and statistical data show that the Taos'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are shaped by their particular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interacting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n almost all cases, people with the experience of migrating to Taiwan and their symptoms of mental disorders began in Taiwan instead of in their isle community. I argue that the fact that the Tao members of the 25-60 age group have to migrate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aiwan and Orchid Island to pursue education and find jobs creates a significant state of anomie in their aboriginal society, which, in turn, is a consequence of this society's involv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Migrating to Taiwan, a Han-dominated society, at the age of about 15 or 16 with little support from their families, they are prone to experiencing frustration.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ir common frustrating experience of migration and the mental disorders prevailing among them.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traumas caused by the particular migration experience are not just individual experience. They represent the common dilemmas that those Tao members who receive modern education in the postwar period encounter. Under the siege of dramatic social change in the aboriginal society, they have no alternative but to leave their isle to make a living. Tao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their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interacting with the outside world, however, have intensified the traumas from which the migrating members suffer and contributed to the prevalence of mental disorders among them.

*Keywords: gene, Tao minority, migration, social suffering, mental disorder*

## 一、問題緣起與問題意識

2000年3月4日，我第一次到蘭嶼。從台中出發，坐了五個多鐘頭的火車，抵達台東新站。一出車站門口，便見到一長排的計程車陣。我問了一下價格，從火車站到機場，不到十分鐘的車程，一律要價300元。當時有一輛已經載客的計程車，正要離去。我馬上試著攔下，心想這樣可以趕快擺脫那些計程車陣的糾纏。突然之間，一個看似「大哥」的人物從一旁衝了出來叫囂著：「如果你敢載我們的客人，我就要你死得很難看。」面對這樣的情境，我只有自行走路到機場。到了蘭嶼，我向來接我的Syaman H談到一路所經歷的交通狀況，他生氣地告訴我：

計程車還是敲小筆的，航空公司更是敲竹槓，有次我妹妹開學了急著要回台灣讀書，結果直升機人沒坐滿，就要求一個人要付雙趟的錢，從蘭嶼到台東一個人一趟5600元，我們去反映也沒用，航空公司還說：這是一條賠錢的航線，要不然就停掉，就吃定我們了。(2000-1B-2)

Syaman H的抱怨不是特例。長期以來，當地的居民對交通問題，一直相當不滿。1968年開元港開設，蘭嶼輪始航，1969年小飛機定期飛航蘭嶼與台東之間。交通的改善，加深蘭嶼對外界的依賴，卻未必使達悟人迅速走向一個更好的生存環境。往後的田野過程中，我深切體會到達悟人來台的艱辛。除了交通費非常昂貴外，<sup>1</sup> 相較本島原

1 以2007年的飛機票價為例，台北到台東單程2,060元，台中到台東單程2,334元。台東到蘭嶼，19人座的小飛機單程1,408元，輪船則是900元。所以一趟台北到蘭嶼飛機往返的票價是6,936元，台中到蘭嶼往返的票價是7,484元。1997年5月到2000年之間，曾有直升機飛往蘭嶼，有8-12個座位，單程2,800元，現已停飛。Syaman H的妹妹需繳雙倍的錢，是因為過年包機的班機，乘客沒坐滿。現在的直升機飛往蘭嶼以時間計費，一小時十萬，屬包機式。目前台東富岡港往蘭嶼的客輪較不固定，必須事先洽詢，票價也比往綠島貴（全票單程1,000元、來回2,000元）。資料來源：松山

住民回家的過程，台灣到蘭嶼的路途必須承擔更多不確定的因素。有時遇到氣流不穩，坐在小飛機上有如雲霄飛車般驚險。或者，遇到氣候不佳，小飛機停飛，在機場耗費好幾天等待補位，夜宿台東或滯留於蘭嶼好幾天飛不出去，二十一世紀初這些達悟人司空見慣的生活經驗，體現了他們進入現代社會的窘境。

1995年《聯合報》報導達悟青壯世代遷移台灣經驗與島內精神疾病比例增高的關連，有以下的描述：

……蘭恩基金會總幹事林茂安說，這些「發瘋」的達悟（雅美）人，<sup>2</sup>有一些共同的特徵：他們都很年輕，而且都是去台灣本島工作過一段時間後，回來就成了精神病患。……蘭嶼青年施明發說：當初期望太高，失望也大，而異鄉遊子無親無故，家又在海的那一邊，一切都要靠自己，此時若加上環境的刺激，當然會有可能變成精神病。那麼，問題回到根本，達悟孩子為什麼非去台灣工作不可？鄉長廖班佳的話一針見血：蘭嶼根本沒有工作機會。（聯合報 1995/6/5）

上述報導指出一個事實：從 1972 年第一屆蘭嶼國中九年義務教育的學生畢業，大多數達悟年輕人在 15、16 歲國中畢業後，就必須來台求學、工作。蘭嶼特殊的地理位置，交通不便，來回交通費的開銷，加上隻身在台缺乏家庭支持、惡劣的工作情境，誘發了年輕人罹患精神失序(mental disorder)<sup>3</sup>的可能。在往後逐漸深入的田野調查中，

---

機場國內線核定票價 [http://www.tsa.gov.tw/2005tax/chinese/c\\_ticket.htm](http://www.tsa.gov.tw/2005tax/chinese/c_ticket.htm)，查詢時間：2007年5月14日。

- 2 蔡筱君(1997: 17)針對達悟族人的訪談發現，許多達悟(Tao)人對「雅美族」稱謂的看法多認定是當初日人與他們接觸時，由於溝通的問題，錯將族群面對他者時的稱呼「Yami（我們）」，視作族群的稱謂。雖然，目前國家認定的官方資料正式族群名稱仍為雅美族，可是近年來大眾媒體、部分學術論文已經不再用「雅美族」(Yami)，而是改用「達悟族」(Tao)。為尊重達悟人正名運動，本文書寫上以「達悟族」為主，但在有些舊有文獻，原用雅美，我則以原文加括弧引用，以做區隔。
- 3 本文使用比較中性的「精神失序」(mental disorder)一詞，精神疾病(mental illness)通常直接指涉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中的疾病類別(DSM)，本研究並不是完全以精神醫學所定義生物疾病的觀點來理解，所以精神失序一詞較為恰當，對於達悟社會文化如何

我也漸漸理解到：達悟人高比例而獨特的精神失序現象，是他們做為一個孤立小島上的少數族群，別無選擇地被捲入現代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所造成的結果。在這個難以迴避、因而無可奈何的變遷過程中，達悟人因為相對於台灣本島與漢人社會的邊緣少數族群身分，經常充滿進退失據的困窘與挫折。達悟人的這種集體困境，集中呈現在目前 25 到 60 歲之間的青壯人口身上，事實上他們就是晚近精神失序發病所集中的世代，也是達悟人開始接受現代教育的第一代。他們為了維持自己與家庭的生計，幾無例外地必須來到台灣本島求學或謀職。上述計程車與小航機的問題，具體而微地反映他們不得不來往遷移於蘭嶼與本島之間所經歷的痛苦；而這種交通問題，只是他們所普遍遭遇的種種困窘與挫折的一小部分而已。就像我的兩位受訪者所說的：

妳從小到大就知道在蘭嶼的另一個地方，是比這裡資源更多。妳就會想說嚮往要去台灣，學更多的東西，找更好的工作。（33 歲，達悟年輕人 2003-4A-9）

每一個蘭嶼的年輕人都想飛到他的夢想——台灣，可是飛的過程有人會掉到海裏去，有人翅膀會斷掉，有人會殘廢，像我們這裏就有啊，工地工作掉下來腳受傷，結果回來。回來他娶不到老婆，沒有人願意嫁給他，他也沒有辦法去海裏捕魚，這個就嚴重啦！喝悶酒啊，久了就酒精中毒啊！（前蘭恩基金會執行長黃道明 2003-3A-12）

本文的目的，在於探討蘭嶼達悟人的遷移經驗與高比例精神失序的關係，並藉此反省九〇年代之後，基因研究取徑與原住民健康議題之間選擇性親近的關係之限制。主要分析的對象，為晚近達悟人精神失序發病所集中的 25 到 60 歲，即開始接受現代教育的青壯世代。本

---

理解這些被納入精神醫學診斷的個案，請參考蔡友月(2006b)。

文的主要論點認為：達悟青壯人口被迫來往遷移於蘭嶼與本島之間謀求生計，是這個離島少數族群某種集體的社會「脫序」的重要面向。這種原本與外界相當隔絕而孤立的少數族群社會脫序，是無可選擇地被捲入現代社會的歷史發展結果。在平均年齡 15、16 歲，沒有父母陪伴隻身離開原鄉，來到以漢人為主的台灣社會求學工作的艱辛過程中，他們所遭受的種種困境與挫折，與他們這個世代的高比例精神失序之間，有極密切的關係。一個具體的事實：根據我的田野資料，半數以上蘭嶼衛生所登記為精神疾病的個案，首度出現不正常徵兆的地點都是在台灣，而非蘭嶼。這個世代由於遷移經驗而來的身心創傷，超越了個別成員各自不同的個人遭遇，而具有某種清楚的「集體性」。這種集體性，來自於開始接受現代教育的世代所必須面對的共同命運。他們的原鄉蘭嶼經歷快速的社會變遷，而達悟人的特殊歷史經驗與文化傳統，則形塑、甚至加深青壯世代在遷移台灣過程中的困境與創傷。我認為，要理解達悟人晚近廣泛而獨特的精神失序現象，不能簡單地訴諸單一因素，譬如生物醫學方面的基因解釋。我們必須深入田野，接近他們的生活世界與日常經驗，同時也有必要輔以各種文獻資料，釐清其長久的歷史處境與當代命運的關連。

## 二、文獻回顧

### （一）基因論的原住民精神失序研究

晚近達悟族人精神疾病比例大幅增加，是一個引人注意的議題。2000-2001 年一項由國科會補助的「達悟族原住民精神分裂之基因連鎖分析」研究計畫指出，近二、三十年，蘭嶼達悟族人精神疾病的比例有增加的趨勢。從流行病學的角度，其比例高於台灣的五倍以上（台灣漢人為 0.3%，達悟人為 1.6%）。該研究假設達悟族在五、六百年前由菲律賓遷移至此，過去由於種種因素被隔離，幾百年來盛行族內通婚，為一孤立種族的族群。由於近親通婚的結果容易出現易感

性的基因，因此提出基因與高比例精神疾病關連性的假設。<sup>4</sup>

上述基因論的研究，反映 1950 年代之後世界精神醫學中的生物醫學範型的影響力日益擴大，普遍具有獨尊地位(Conard 2001: 225)，朝向一種無心靈的生物精神醫學(mindless biological psychiatry)發展(Desjarlais et al. 1995: 36)。在台灣，九〇年代之後，隨著分子生物學的發達，基因研究成為國科會的重點補助項目。<sup>5</sup> 基因預設也成為近年來探索原住民高比例酗酒、精神失序等健康議題的重要研究取徑。<sup>6</sup> 本文並非要完全駁斥分子遺傳學的進步對人類可能的貢獻，不過上述基因預設的研究計畫，可能過於簡化，會讓我們忽略達悟人高比例精神失序的問題癥結，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

第一、現有統計資料顯示，達悟族精神疾病比例增加是發生在近二、三十年，九成五集中在開始接受現代教育的青壯世代，基因研究並無法為我們提出歷史過程的解釋。1947-1953 年精神科醫師林憲與林宗義主持台灣最早有關原住民精神疾病的研究，比較泰雅、排灣、賽夏、阿美四族，發現這些「高山族」精神疾病比例為 0.39%，幾乎與漢人 0.38% 相同，發病率低是四族共有的現象。雖然這個研究沒有包括達悟（雅美）族，但林憲醫師推測，未開化社會的人際關係較密切，而部落同族間之相互扶助，可能使得嚴重精神疾病的發生減少，使功能性精神疾病的發生頻率較低，而癒後也較為良好（林憲 1978: 22-25）。距離林憲等人的研究四十多年後，一些研究報告指出原住民的健康已經亮起紅燈。1999 年世界衛生組織針對台灣原住民的健康報告指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台灣原住民與漢人的精神疾病比例並無重大差異，但 1960 年代之後，原住民酗酒、精神疾病比例有大幅增加

4 見葛應欽(2001)，研究者以 31 位病人及其一等親家屬為研究對象，有 27 位病患（4 位拒絕）及他們的父母、兄弟姊妹、子女等 74 位親屬採集血液樣本，共粹取出 101 個 DNA 樣品。研究結果雖然沒有發現顯著的關連，研究者推測也許是樣本過小。

5 國科會從 1994 年開始三年期的「基因治療」群體計畫，並於 1998 年起和衛生署合作進行「基因醫藥衛生」尖端計畫，邀請全國醫學中心與研究單位近百位科學家、醫師投入「基因體醫學」研究行列。研究領域包括：基因體基礎研究、基因治療、基因藥物開發、遺傳疾病、實驗動物供應、環境毒理遺傳基因，以及科技對倫理、法律、社會的影響等。見陳長謙(2001: 7)。

6 見葛應欽(1998, 2001, 2004)、胡海國(1995)、鄭泰安(1997)等。

的趨勢(Cohen 1999: 24)。

現有文獻與蘭嶼衛生所的資料也同時顯示，最近二、三十年達悟人才出現精神疾病比例增加的現象。1960 年代人類學家李亦園的研究認為，達悟傳統的文化結構，維護了該族的基本心理衛生。他根據前衛生所廖慶源醫師的報告指出，當時在蘭嶼只發現四人有精神疾病症狀，而其中兩人為癲癇病患（李亦園 1960b）。1982 年公共衛生學者姚克明第一次大規模收集與達悟族健康有關的生活方式與行為的資料，指出工業社會常見的文明病，如高血壓、消化性潰瘍、精神官能症等，在蘭嶼並不常見(1982: 19)。劉珣瑛醫師等在 1993 年的研究報告，則首度指出島上精神疾病的比例異常增加。但當時台灣其他離島區域的精神疾病盛行率，則並未有類似的顯著增加。<sup>7</sup>截至 2006 年 2 月為止，蘭嶼衛生所登記的精神疾病個案共 58 位，加上現住在玉里或其他療養院的患者，以及少數在台灣曾接受精神科治療而衛生所未曾登記的患者，那麼達悟人被診斷為精神病患至少有 60 多人以上。我的田調發現，這些個案九成五以上集中在 25-60 歲者，亦即開始接受國民教育的青壯世代。他們成長於現代性的外力開始嚴重衝擊小島，族人大量遷移台灣工作之際。根據上述六十年代至今的文獻紀錄，以及晚近發病集中的年齡層，我們可以合理地指出，達悟族精神病患比例開始增加，是在這晚近二、三十年的時間。

第二、根據以往人類學的研究，近親通婚的預設，並不符合達悟人的傳統文化規範。人類學家的研究早已指出，達悟人的婚姻多數在第三從表外的遠親，而在亞世系群單位內有很強的外婚傾向。其中禁忌的範圍，包括第一類的同一家宅內親屬、直系親屬、雙系近親群、半兄弟姊妹等近親禁忌與仇家禁婚，以及第二類的夫兄弟婚、妻姊妹婚、叔與姪媳、姪與嬸母等不受歡迎或可恥的婚姻（衛惠林、劉斌雄 1962: 67-77）。晚近的研究也強調，達悟人直到現在仍禁止血親婚

---

7 在 1993 年離島精神醫學研討會中，學者指出澎湖與金門地區的精神醫療狀況：澎湖地區人口 95,466 人，精神病患者 233 人，以每千人口計為 2.44 人（張和平等 1993）；金門地區人口 43,000 多人，精神病患者 238 人，以每千人口計為 5.55（劉文健等 1993）。

姻。父母的兄弟姊妹之子女，禁止通婚，直到這些表兄弟姊妹的子女開始，方可通婚（余光弘、董森永 1998: 4）。

第三、回溯更久遠的歷史，基因研究者假設達悟人為一孤立的「種族」，更值得商榷。1970年代後期以來，美國的體質人類學教科書，基本上已經不認為立基於生物差異的種族(race)分類是一個科學的概念，而質疑種族做為一種實存範疇的合理性(Littlefield et al. 1982: 642)。近年來的研究也指出，所謂的種族團體之內比其之間常有較多的基因變異性(Morrison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Resource Studies 1999)。美國人類學會於 1998 年 5 月針對種族議題所做的一項聲明中清楚的指出，大部分種族內生物性的差異高達 94%，而種族間基因的差異卻僅有 6%。<sup>8</sup>以澳大利亞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為例，他們之間有明顯膚色差異，但沒有確切的證據顯示這些差異會影響疾病的分配(Saggers and Gray 1991: 117-120)。這種假設某種族、族群與基因的脆弱性的研究，近年來在醫學研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當某族群的人口在流行病學上被標定為具有風險，往往很容易形塑出一個申請自身資源的通道，在努力尋找某族群基因脆弱性的背後，醫學也越穩固地建立其科學的地位(Poudrier 2004: 25)。當研究上標示特定人群在生物上的缺陷，某種程度也發揮污名化他者與建構特定社會秩序的作用，強化了種族主義意識形態下的人群分類。

上述基因角度的研究，將原住民精神失序的受苦經驗，縮小到分子層次來理解，無法解釋為何蘭嶼達悟族的精神疾病比例大幅增加，是這二、三十年才發生的事，且高比例集中在青壯世代。這個取徑既不重視社會變遷的歷史過程，也對失序者的主觀受苦經驗缺乏興趣。為了彌補上述基因取徑的缺失與不足，本研究嘗試從社會學的角度討論達悟人遷移經驗、長期社會變遷與其精神失序之間的關係，以分析達悟人高比例精神失序的核心肇端。

---

8 參見美國人類學會網站 <http://www.aaanet.org/stmts/racepp.htm>，查詢時間：2007 年 5 月 16 日。

## (二) 遷移、精神失序與原住民面對的現代性歷史變遷

二十世紀初因戰爭、工業化、全球化發展，全世界跨國移動與境內城鄉遷移的人口增加，不同背景的移民與遷移地的關係，逐漸成為社會學持續關懷的重點。英語世界有關遷移與心理健康的研究，最早是以美國社會為主，分析不同移民文化衝突與調適的社會心理問題。在同化主義的架構下，早期 Rober E. Park (1928)、Everett Stonequist (1937)將同化視為一自然過程，認為移民最終會同化至美國社會的大熔爐中。如 Park 邊緣人(marginal man)的概念，即描述移民無法融入主流社會，長期遭受文化衝突與認同危機所導致的負面邊際人格。1960 年代之後同化主義的觀點受到質疑，強調不同族群間在美國移民社會彼此的異質性，認為不同族群的移民者會再製族群與文化內涵，而非成為美國化的犧牲者。不過這些論述的關懷對象，主要是跨國移民與其後代，而非往返於都會區和保留區的印地安人。事實上，原住民被迫遷移的歷史過程往往迥異於上述討論對象，一些研究者因此特別指出，我們必須敏感到原住民獨特的歷史社會文化脈絡所產生的心理健康問題(O'Neil 1996; Kleinman 1988: 11)。

此外，上述所引的移民研究的討論，大多並未將心理健康進一步連結到精神失序。將二者扣連的，主要是基於早期兩個量化研究的假設：選擇性論(selection hypothesis)者，認為那些具有精神失序的基因，或本身已罹患精神疾病的人喜歡遷移；壓力假設論(stress hypothesis)者，則認為移民過程中所面臨的社會心理壓力，容易讓人罹患精神疾病(AI-Issa and Tousignant 1997: 4)。早期美國醫療社會學有關心理健康致病因的討論，正是延續了壓力假設所發展的一系列有關社會壓力源(social stressor)、壓力的適應模式、生活事件的改變、壓力與社會群體的研究(Cockerham 1992: 71-80)。就探討少數族群精神失序的發病因子而言，我認為這些量化取向的研究普遍有兩點限制。首先，將壓力以標準化的方式度量，不但複製了精神醫學放諸四海皆準的診斷模式，也無法充分地說明少數族群、不同文化群體面對不同生活事件的壓力時，彼此的差異。換句話說，量表評估的是壓力改變的

量，並不涉入當事人對生命事件的意義詮釋。而精神失序之所以異於其他疾病，正是在於精神失序者的自我概念明顯受到影響。關注個案的生命史與主觀感受，並試圖貼切地描述分析這一個個受傷的自我，及其較大社會歷史脈絡的關連，正是本研究從質性研究出發的重點所在。其次，精神失序的致病因，往往並不是一個單向因果關係。具有精神醫師背景的人類學家 Arthur Kleinman 就反對以 X-Y 變項間的簡化因果(causation)機制來探討精神疾病的致病因，他說：「精神疾病的因果，是脆弱的生物、心理、與那種容易使人陷入突發事件的險境之社會來源之間彼此複雜的互動。往往某一類型的脆弱性會被其他類型所強化，這並不是孤立分離的風險因子，而是一個系統性彼此相互關連的網絡，因果這個詞本身就是一個誤導」(1988:58)。換句話說，以變項來分析壓力與心理健康的關係，較缺乏對社會結構宏觀面向的探討。因此，當我們思考遷移與精神失序的複雜現象，必須深入不同移民者的族群背景、社會結構位置等所涉及的各種風險條件。不能簡單地專注於某個單獨的因素，也不能窄化至基因分子層次來理解，如此才能釐清問題癥結。

在九〇年代後的台灣，由於全球化與跨國遷移的熱潮，有關外籍勞工、外籍配偶、偷渡客的討論增多，如：夏曉鶯(2000)、藍佩嘉(2002)、趙彥寧(2004)等等。這些研究觸及了移民社會學中有關國族想像、性別認同、社會不平等的議題，提供我們瞭解台灣新移民可貴的參照，並有助於我們重新思索台灣族群關係的內涵。然而，相較於全球化浪潮所引發的社會學界對這股「新」移民潮的高度關注，原住民青壯世代城鄉遷移的經驗、外勞引進後對原住民社會的衝擊、以及急速社會變遷下產生的家庭功能弱化、傳統社會文化規範解組，進而出現行為失序的現象等，這些當代台灣原住民生存持續惡化的「舊」族群議題，則較少受到晚近社會學界的青睞。

過去有關台灣原住民遷移與心理健康的研究，主要在「都市原住民」的概念下，指出六〇年代之後，台灣各族原住民因生計經濟型態的改變，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從原鄉遷移至台灣各城市，面臨文化衝

擊、城鄉差距、弱勢族群身分三項主要社會心理適應癥結（傅仰止 2001；林金泡 1981, 1996 等等）。人類學家李亦園(1978)也指出，遷移平地的原住民職業多屬工人階級、收入水準低、人際關係孤立，並因此推測遷移城市的原住民容易有較高比例的精神官能症。精神科醫師林憲(1978)則認為，少數族群精神異常比例較高的原因，與社會文化本質及文明化的過程有關。這些討論，大多不是針對特定族群，把不同族的原住民統歸於「都市原住民」的類屬，容易忽視各族原住民不同的遷移歷史經驗與文化差異。我以下的討論將指出，日本殖民統治以鎖島政策管理蘭嶼，使達悟人相較於本島原住民，與外界接觸晚、互動更少，這些結構性、歷史的緣由都使得六〇年代後才陸續遷台的達悟青壯世代，相較於本島原住民或漢人的城鄉遷移，更加艱辛。

許木柱、鄭泰安(1991)曾比較泰雅族與阿美族的個案，指出泰雅人由於受到遷村及年輕人大量外流的結果，導致傳統的社會組織崩潰，減低了對成員的社會心理支持。相對地，阿美族的伸展家庭型態與強調人際合作的特性，對族人的健康所提供的支持強度明顯不同。他們兩人的研究也提醒我們必須注意到，不同族群的社會組織、家庭型態與文化特質等，都可能會影響著精神失序發病的可能性。這樣的研究結果，也回應一些英語世界的實證研究發現，亦即遷移並不必然會誘發精神失序，國家政策、社會支持網絡、家庭結構、文化衝突的處理方式等，才是決定移民者罹患精神疾病的關鍵因素（Al-Issa and Tousignant 1997; Portes and Rumbant 1996; Kitano 1969 等等）。根據 2005 年 2 月蘭嶼鄉各村里住戶人口統計資料，蘭嶼島居民共計 3,659 人，留在島上的人口約一千多人左右，外移的人口已從 1970 年代的四成多，增加為六成。<sup>9</sup>達悟為台灣十三族原住民中人口較少的一族，人口僅多於邵族與噶瑪蘭族，遷移人口呈現多核心分散全省各地的聚居模式。這使得傳統分享互惠的社會支持網絡在台灣缺乏運作的機制，再加上長達數十年的家屋改建政策造成的家庭功能失調比例增

9 根據 2000 年度內政部統計資料、蘭嶼衛生所資料推估而得的數據。

高，這些特殊的因素都增加遷移台灣達悟青壯世代的精神失序可能性。然而，相較於自然科學或社會人文學者對蘭嶼其他方面的重視，島上達悟人面對現代性衝擊的自我認同與心理健康，尤其是越來越多遷移台灣、擺盪於漢文化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青壯世代及其精神失序等相關問題，則很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sup>10</sup>

站在上述研究的成果上，如果我們進一步參照世界其他原住民經驗，那麼可以發現，從長期歷史變遷的分析角度，對於理解達悟人高比例精神失序的特殊現象，尤為重要。1999年世界衛生組織一項針對原住民心理健康的報告指出，社會失序、流行病、人口減少與征服，使世界各地的原住民都有高比例的憂鬱與焦慮，而他們普遍經驗了創傷與土地遷移，以及長期的壓迫。不過關於各地原住民心理健康與治療所需的實際資料，至今都相當缺乏(Cohen 1999: 2-3)。一些關於前蘇聯、中南美洲等世界不同地區原住民健康的個案研究也指出，他們被迫遷移、家庭解組、文化喪失等所造成的歷史創傷(historical trauma)，才是心理問題的根源(Vakhtin 1992; Almeida-Filho 1987: 9; O'Neill 1996)。在世界衛生組織關於世界原住民心理健康報告中，Alex Cohen曾在警告基因研究與原住民健康議題結合的危險時，如此綜結：「如果你想要將原住民精神疾病當成是來自遺傳的，一個更明顯的證據，貧窮、戰爭、被迫遷移可能是更重要的。不管在世界任何地方，不同的年齡、性別、文化，危及心理健康最重要的因素是社會的混亂瓦解」(1999: 18)。從長遠的歷史變遷來看，在近幾百年來現代世界的發展下，原住民往往變成現代性進步下的犧牲者。與上述世界各地的原

10 目前有蘭嶼達悟族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獻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第一、中研院民族所為主的人類學者在南島語系研究的架構下，針對傳統達悟族社會組織、親屬關係、經濟模式、祭典儀式等累積了不少的貢獻，例如：李亦園(1960)、衛惠林、劉斌雄(1962)、余光弘(1994)等。第二、從空間生產的社會過程探索蘭嶼居住環境的問題，包括傳統地下屋的空間記錄，如日本學者鹿野忠雄、烏居龍藏與一些國內早期人類學者等零星的討論，更晚近的台大城鄉所、中研院台史所等相關的研究計畫，以及夏鑄九、陳志梧(1988)、蔡筱君(1997)、張興傑(1998)等。第三、從族群政治經濟學所開展出來，有關蘭嶼的「反核廢料運動」、「自治運動」等相關研究報導，如：黃雅惠(1990)、紀駿傑(1997)、盧幸娟(2001)等。既有的研究，對於達悟族在快速社會變遷下高比例的精神失序、日益嚴重的喝酒問題等都較少觸及與討論。

住民一樣，達悟人也面臨現代性給少數族群帶來的嚴酷挑戰。

從現代性長期社會變遷對原住民社會衝擊的角度來剖析，我們可將他們的精神失序當成是 Kleinman 所謂的一種「社會受苦」(social suffering)。Kleinman 認為疾病受苦的經驗，基本上是社會的。首先，受苦本身是「相互主體性」的(intersubjective)，譬如癌症、憂鬱、心臟病等疾病，事實上都涵蓋人與人之間的某種經驗，是一個具有關係性的受苦類型。其次，所謂受苦是社會的，意味著心理或健康問題有社會結構的根源。因此，社會受苦強調一種整體性的分析視野，而非將受苦窄化為一些可測量的變項。最後，社會受苦一方面既源自於政治、經濟、制度的權力如何作用於人們，另一方面也是人們回應這些社會因素及變遷的方式所造成的結果(Kleinman 1995: 396-397; Kleinman et al. 1997)。達悟人高比例的精神失序，不僅是他們長遠以來身為離島原住民的獨特少數族群處境所激發的現象，也是他們不得不以獨特方式回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快速劇烈變遷之下的結果。這些回應方式，涉及年輕世代被迫遷徙於台灣本島求學求職而連帶產生的生存壓力、焦慮、自我認同危機等，都加強了精神失序發生的可能性。將達悟人精神失序視為一種社會受苦來理解，亦即不單單以生物基因，或相對的以少數變項間的關係來理解疾病根源，而是將疾病視為長期社會變遷下人們處於不利與無力的位置所造成的負面結果。

本文將達悟人高比例精神失序視為一種社會受苦，分析焦點為青壯世代遷移來台的特殊歷史際遇與多重受挫經驗。第一部分主要探討相較於本島其他原住民，達悟人遷移過程的歷史特殊性。第二部分分析遷移來台的達悟年輕人所面臨的各種工作、求學、生活的困境。根據我的田野調查，衛生所登記的個案半數以上在台灣發病。究竟他們來台工作或求學遇到什麼挫折？這些挫折是否與少數族群不利的社經結構有關？在族群接觸過程中，他們所承載的達悟傳統文化特質在漢人為主的台灣社會產生什麼衝突？本文將指出傳統／現代的夾心餅乾壓力下，讓這些國小、國中畢業後直接來台的達悟年輕人，必須不斷

遊移於台灣與原鄉之間。這些低學歷的年輕人在台灣向上流動的管道受阻，加上達悟傳統文化強調個人成就，於是使他們處在無法掙脫的雙重束縛中。來台的達悟人口少，奠基於傳統部落"zipos"血緣關係所形成的人際網絡已明顯弱化，使得 15、16 歲隻身來台的年輕人，在無依無靠的情形下容易發病。

### 三、研究方法與資料

2000 年春，我首度隨著馬偕醫院的「蘭綠計畫」工作人員到蘭嶼，進行偏遠醫療的專題採訪。當時我是台灣某家報社醫療版的編輯，在五天的採訪中，我隨馬偕醫院的精神科醫師與蘭嶼衛生所護士，馬不停蹄地跑了六個部落，採訪大約 30 多位經醫師診斷為精神疾病的達悟人，以及當地有關獨居老人居家照護的問題。

回學院念博士班後，我持續關注這個議題，從 2003-2006 年，我共有六次以研究者的身分，隨著馬偕的醫療團隊飛往蘭嶼，並跟隨精神科醫師與蘭嶼衛生所護士進行全島居家訪視，每次待在台上的時間約一個月左右。田野期間透過報導人以及部落中一些熟識朋友的協助，我大多於部落內個案的家庭進行深入訪談與田野觀察。根據 2006 年蘭嶼鄉衛生所收案的 58 位個案資料檔，扣除長期住院與在台失去聯絡的個案，本研究以 51 個個案與他（她）們的家人，做為田野觀察與訪談對象（表一）。此外，我認為要了解達悟人遷移來台的經驗，必須關注他們在台灣的生活狀況。因此，從 2002 年初開始，我也陸續以滾雪球的方式，在台灣尋找願意接受訪談的達悟族青年，這些訪談大多在他（她）們租屋處、同鄉會與非正式聚會進行。

方法上我主要以開放民族誌的田野觀察，進入原住民部落，以加深對於經驗現象的瞭解。在資料的蒐集、過錄與概念提煉上，運用 Barney Glaser 與 Anselm Strauss 所提倡的「紮根理論研究法」(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 approach) (Glaser and Strauss 1967)。在田野資料蒐集的過程中，從資料中抽取概念，逐漸將現象範疇化，進而釐清

表一 個案基本資料表

| 變項      | 人數       | 百分比  |
|---------|----------|------|
| 性別      |          |      |
| 女       | 13       | 25.5 |
| 男       | 38       | 74.5 |
| 年齡      |          |      |
| 20-30 歲 | 9        | 17.6 |
| 31-40 歲 | 16       | 31.4 |
| 41-50 歲 | 19       | 37.3 |
| 51-60 歲 | 4        | 7.8  |
| 61 歲以上  | 3 (一人已歿) | 5.9  |
| 教育程度    |          |      |
| 日本教育    | 2        | 3.9  |
| 不識字     | 1        | 2.0  |
| 國小      | 12       | 23.5 |
| 國中      | 21       | 41.2 |
| 高中職肄    | 1        | 2.0  |
| 高中職畢    | 10       | 19.6 |
| 大專肄     | 2        | 3.9  |
| 大專畢     | 2        | 3.9  |
| 婚姻狀況    |          |      |
| 未婚      | 33       | 64.7 |
| 同居      | 1        | 2.0  |
| 已婚      | 14       | 27.4 |
| 喪偶      | 1        | 2.0  |
| 離婚      | 2        | 3.9  |
| 疾病診斷    |          |      |
| 精神分裂症   | 31       | 60.8 |
| 情感性精神疾病 | 12       | 23.5 |
| 妄想症     | 2        | 3.9  |
| 器質性精神疾病 | 3        | 5.9  |
| 未知      | 3        | 5.9  |

(n=51)

不同範疇現象間的關係，發展為本文的論點。我同時也蒐集相關的歷史文獻資料，包括學術機構或民間團體的報告、檔案、二手的統計資料、蘭嶼當地的出版品、報章雜誌、期刊等。這些資料有助於我掌握達悟人社會變遷的歷史過程等，並與田野中所觀察和訪談的個人生命史交叉對照。

## 四、研究結果與分析

### （一）達悟人遷移台灣的歷史變遷與特殊性

分析田野中 51 個個案最初遷移台灣的動機，有 44 人是為了工作，有 7 人是為了求學。對於這些來台求學工作的達悟青壯世代而言，台灣代表追求現代性下美好生活的一個標竿。仔細分析他們遷移來台的理由，我們可以發現，這些看似個人的因素，背後呈現的是一個少數族群在社會變遷下被迫遷移的結果。因此，我們有必要把這個現象放入歷史脈絡來分析，才可釐清相較於本島其他的原住民族，這些接受現代教育的達悟人遷移經驗的歷史特殊性。

#### 1. 第一階段：日據時期（1895-1945 年）

居住蘭嶼島上的達悟族，因地處海上的孤島，發展出特有的漁撈經濟。傳統經濟主要以耕種山芋、水芋等自給的生計經濟為主。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蘭嶼隨同台、澎割讓給日本。當時日人認為蘭嶼無開發價值，並以保障學術研究為理由，將蘭嶼特意封閉為日本人類學家研究的後花園。相較本島其他族原住民，日人的閉關政策使得蘭嶼較少受到外力干預，仍維持著較為傳統的生活方式。1918 年日人雖在蘭嶼設立交易所，隸屬台東縣警察協會，由當地警察管理，交易方式主要是以物易物的方式（李亦園等 1990: 286）。

地處離島的達悟族，接受漢人傳入的新文化極少，相較本島原住民，涵化程度與生產力都很低，收入也最少，在教育、交際、衛生、娛樂的支出近乎於零，是當時台灣原住民生活水準最低的一族。此外，由當時各原住民的自給率與消費狀況，也可以看到蘭嶼達悟人比

其他原住民族更孤立的情況。根據王人英的研究，以 1933 年為例，原住民其他各族的自給率大約在 84% 到 91% 之間，而達悟族則高達 99.19%，將近百分之百。王人英因此指出，「可見 Yami 族社會十分孤立，涵化程度最淺，社會文化接觸對經濟生活改變的影響最少」（1967: 155-156）。

## 2. 第二階段：中華民國政府來台初期（1945-1960 年）

台灣光復之初，原住民的社會經濟運作情況大體上仍屬於封閉系統。1950 年代，政府推動的三大運動，如：「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辦法」、「獎勵山地實行定耕農業辦法」和「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才逐漸與大社會有較密切的接觸。但前兩個運動與蘭嶼關連不大，生活改進運動因缺少實質動作而停留在意識形態的宣告；定耕政策因不符合蘭嶼生活習慣，以及定耕作物無法納入台灣市場體系而無成效。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則在經濟整合目標掩護下，合法而片面的讓政府各部門在蘭嶼的聚落空間中進行改造（李亦園等 1990: 168）。

1958 年台灣省民政廳開始實施山地保留地地籍測量與調查，這是台灣原住民社會真正因外來力量引起較基礎性的變遷，加上國內工商業開始有重大改變，因此市場經濟的觀念開始影響原住民（黃應貴 1975；李亦園 1978: 718）。由於外來力量作用不同，也造成各原住民的變遷過程有所差異。從日據時期到中華民國政府來台初期，台灣各族原住民已經開始有小型的商業交易行為。但是，對生活在隔絕小島的達悟人而言，貨幣、交易等商業的知識，卻是低度開發的狀況。鮑克蘭指出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

原始的社會，有其特殊的經濟制度，與我們現行的經濟制度迥不相同。其最大的特色為沒有貨幣，不以貨幣為交易的媒介和價值衡量的標準。……直到最近為止（筆者註：當時為 1959 年），雅美人尚不知道使用貨幣。他們獲得一些銀幣，即用來做飾物，或融化之而打做成銀盞。當他們與巴丹島交

往時，他們始以豬、山羊和山蔗與巴丹島人交換金子。  
(1959：185)

在日據時期與中華民國政府來台初期，相較於本島其他原住民族，達悟人與漢人社會接觸極少，經濟型態仍維持自給自足的生計經濟。對外的交通極不便利，島內的環島公路尚未接通，整個島仍過著無水電的單純生活。

### 3. 第三階段：快速變遷期（1960 年之後）

從達悟族的歷史發展的過程來看，我們可以發現 1960 年代以前，達悟人仍是處於一個自給自足、較為孤立的社會。1960 年代之後，各種外力進入，蘭嶼門戶大開，整個社會結構在極短的時間內經歷前所未有的改變，這也推動了光復後出生的達悟青壯世代開始大規模遷移台灣。對於我們理解晚近達悟人高比例精神失序的現象，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關鍵時期。我們必須分析這段歷史變遷過程的特殊性，才可以釐清這些接受現代教育遷移台灣的達悟人，所承受的心理壓力何以如此巨大。

1960 年代，市場經濟模式逐漸進入原住民部落，完全封閉的自主經濟早已不存在。黃應貴從一些個案研究中指出，（本島）高山族社會中，市場經濟絕非突然發生。事實上，農產品的商業化等，在日據時代已開始，雖然比例很小，但並非絕無影響。尤其日人推廣的水稻種植本身，更影響了私有權觀念乃至最大利潤追求態度的建立（黃應貴 1981: 115-116）。由於前兩個時期蘭嶼維持的封閉性，使得達悟人比其他本島原住民更欠缺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學習。1967 年外來民間資本以「觀光業」形式進入蘭嶼，1968 年機輪船通航、開放觀光以及引入外來資本，打開了蘭嶼的門戶，從 1960-1970 年代開始，短短三、四十年，整個島經歷快速的變遷。原本在前兩個時期與外界隔絕的蘭嶼，受到台灣經濟體制的牽絆，開始納入「商品交易」與「市場經濟」的依賴關係中。貨幣所帶動的商品消費習慣也開始滲透到傳

統的部落社會，這些原本靠海為生的達悟人逐漸進入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成為薪資受雇人。

從 1960 年代開始，台灣一些本島原住民陸續遷入都市。原住民在 1960 年代後期到 1970 年代初期，開始大量前往都市地區，主要可歸諸兩個因素：(1)省民政廳 1958 年起開始測量、調查山地保留地的地籍，使原住民對土地私有權的概念有了新的認識。(2) 1960 年代左右平地工商業有重大轉機，工廠對勞工的需求量大增（黃應貴 1975, 1981；李亦園 1978: 718）。整體而言，山地農業的式微、貨幣與市場經濟的介入、台灣經濟起飛夾帶的就業機會，以及消費習慣進入部落社會等，都促使新一代的原住民對都市充滿嚮往。

在外在大環境的衝擊下，這股外移的現象也同時影響離島的達悟人。達悟人遷移到台灣的歷史並不長，主要從 1960-1970 年代開始，受到內推外拉兩股結構的力量。一方面，六十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經濟結構轉型產生拉力，亦即台灣經濟朝向出口導向，新興的勞力密集製造業亟需大量勞動力投入（蔡明哲、傅仰止等 2001: 2）。另一方面，六十年代中期，達悟人開始面臨人口增加，<sup>11</sup>傳統生計不足應付的困境。七十年代開放觀光、外來資本進入，在貨幣經濟衝擊下，達悟社會逐漸遠離傳統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觀光、外來資本，造就了少數人在當地的就業機會。但是蘭嶼當地觀光事業的經營，大多掌握在漢人手裡。大多數達悟人既缺乏大資本的投資，也沒有經營技術。外來資本在蘭嶼當地所創造的，只是低收入的服務工作（如侍者、服務生、腳伕、店員等），並沒有真正提供達悟人充分就業機會。根據蘭嶼戶政事務所 1989 年的統計資料，蘭嶼鄉就業人口 95% 以上是屬於自營作業者和無酬家屬工作者，亦即除了小部分經營獲利低的商店外，大部分仍從事傳統的漁、耕等維生方式。至於受僱於他人以換

11 蘭嶼在 1942 年前是屬於傳統生活期，人口大致呈穩定狀態。除了 1916 年發生癩痺症和 1921 年赤痢的大流行，致使人口顯著滑落外，人口大致保持在 1,600 人上下。1946 年光復後至 1958 年的恢復期，達悟（雅美）族人仍能在保持其傳統的生活方式下，人口顯著的成長，逐漸恢復到二次大戰前的人口數量。從 1960 年代開始，達悟族社會文化正逐漸遭受空前的衝擊，人口結構亦在此時呈現前所未有的改變，1960 年代人口增至 1,982 人（李亦園等 1990: 269-270）。

取貨幣者，比例很小（李亦園等 1990: 385）。簡言之，蘭嶼島上受到各種外力的衝擊，傳統生計經濟逐漸式微，加上缺乏適當的就業機會，因此加速青壯世代外移到台灣，出賣勞動力以換取生活所需。

一些相關移民研究，都指出移民如何透過資本與人脈累積，在移居地的社會經濟體系中向上流動。例如移民文獻中強調少數族裔移民群企業叢(ethnic enclave economy)的重要性。這種企業叢不但能夠吸收新近移民勞力，使新來移民容易在移居地社會就業，免於受到主流社會就業市場各種制度的約束繫絆，在移民進入本族裔的企業叢後，更能在資本、技術、社會網絡等各種資源上彼此協助，方便在職業位階上求進一步的發展機會。另外在同族裔的企業內就業，可以免於族群偏見和其他歧視因素，而由比較熟悉的網絡管道爬升(Portes and Manning 1984; Wilson and Martin 1978)。分析這些 25-60 歲具有來台謀生經驗的達悟人，受限於少數族群與第一代移民的身分，普遍缺乏資金、技術、社會網絡等條件。1990 年代之前，這些達悟移民很難形成少數族裔移民群企業叢，爭取集體向上流動的可能。柯志明(1993)對五分埔成衣製造業者的研究發現，這些五分埔成衣製造者大多來自農村移民，早在他們遷移都市前，台灣的農村早已高度商品化。出身農家的移民其實累積了相當多的市場經驗，有助於適應都市的市場經濟，並有可能創造向上流動的空間。相較於早期台灣農民移居都市之前所具備向上流動的市場條件，達悟人也不具備。這群 1960 年代之後遷移來台的第一代達悟人多數受錮於社會、經濟的不利位置，很少有往上流動的機會，<sup>12</sup> 這些結構性的限制與不利的處境都加深這些遷移來台的達悟青壯世代的挫折與衝突。

## （二）現代性社會變遷與個人認同轉變：達悟青壯世代與遷移

1968 年政府把國民義務教育延長為九年。1969 年蘭嶼國中在紅

---

12 1960 年代社會多元文化多元價值的呼聲下，開啟了一些空間，讓某些達悟族菁英擺脫底層勞動的工作模式，而有向上流動的可能性，例如：立委辦公室的主任、公視記者、西餐店的老闆娘，但這些個案仍屬於極少數，分析他們的家庭結構，並未因個人的向上流動，而推動集體向上流動。

頭試辦，次年在椰油正式設校，規定全體學生一律住宿。蘭嶼衛生所登記的精神疾病個案，大多是國民政府統治後出生的青壯世代，他們大多經歷國中集體住校的生活。國家教育所宣揚復興中華文化的漢化教材，無形中強化台灣社會進步、富裕的印象。現代教育的訓練也使得年輕一代逐漸遠離傳統的生計技術，培養進入台灣勞力市場的基本能力。在缺乏就業機會與升學管道的情況下，<sup>13</sup> 15、16 歲遠離父母隻身來台工作或求學，也成為開始接受現代教育的達悟青壯世代共同的命運。

根據蘭嶼衛生所的病歷紀錄，以及我的田野資料，目前被收案為精神疾病的個案，只有三位 60 歲以上的老人（一位於 2004 年逝世），這兩位老人是在日據時期受教育與成長的。近二、三十年達悟人高比例的精神疾病個案，九成五以上集中在開始接受現代教育的世代。他們出生於二次大戰之後，成長期間涵蓋蘭嶼與台灣接觸尚不頻繁的階段，以及蘭嶼開始受到現代性力量衝擊的階段。換句話說，這個世代是集體來台工作或求學的第一代，其成長過程經歷了社會不同價值體系與生活方式劇烈的改變。

達悟人稱「貨幣」為"niz-pi"，原本用來指稱一些「古老而有價值的東西」，後來「貨幣」傳進蘭嶼之後也漸漸被達悟人認定為「現代而有價值的東西」（楊政賢 1998: 14）。隨著社會轉型，不同世代的達悟人，受到貨幣經濟影響程度的不同，遷移台灣的模式也不盡相同。我將這些被納入衛生所收案的個案，劃分為老、中、青三代，分析比較這三個世代的遷移模式與社會經濟結構轉型的關係（表二）。<sup>14</sup>

不管是來台零星打工的老人家，還是開始接受現代教育的青壯世代，他們來台工作後，資本主義的貨幣邏輯便形塑了一套新的價值觀。2003 年春，我隨醫師、護士訪視 70 歲的個案 Sypan-Da (No.23)，當時他與太太住在山上臨時屋，他只會說傳統達悟語與日語，看到我

13 詳見本文後面第三節(p.26)有關教育的討論。

14 我之所以劃分三個世代，主要是以是否接受現代國民教育為主要判別。依年齡層區分現代教育的第一代、第二代，仍有稍許的誤差，例如有兩位 30 歲左右個案是屬於現代教育的第二代。由於誤差不大，因此仍以此做區分。

表二 三個世代的遷移模式與社會經濟結構轉型的關係

| 世代                                     | 目前年齡   | 田野個案 | 遷移模式  | 所處社經結構   |
|--|--------|------|---|--|
| 老人世代<br>日據時代至<br>民國初期出生<br>(1946年以前出生) | 60歲以上  | 3    | 在五〇至六〇年代陸續來台打工，零星的從事林業、造林等工作。每次來台時間都不長，通常工作一、兩個月便回蘭嶼。               | 成長於蘭嶼與台灣往來尚不頻繁的年代，大多保有較為接近傳統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以傳統的達悟語為主，受過日本教育的老人，有的會說或讀簡單的日語。                   |
| 接受現代教育的第一代<br>(1946-1981年出生)           | 25-60歲 | 43   | 開始接受現代教育的第一代。大多國中、國小畢業後，隻身前來台灣工作或求學。九〇年代前期年輕人遷移來台大多以工作為主，遷移模式是來回遷移。 | 出生於二次大戰之後，成長歷程是蘭嶼和台灣的接觸尚不頻繁的階段，橫跨到整個島開始受到現代性劇烈衝擊的階段，親身經歷了整個社會不同價值體系與生活方式的改變。會說基本的達悟語與國語。 |
| 接受現代教育的第二代<br>(1981年以後出生)              | 25歲以下  | 5    | 接受現代教育的第二代。大多是高中畢業後來台工作，或國中畢業後，來台工作或就讀高中。                           | 出生於八〇年代之後，生活方式、飲食習慣等趨近於現代社會。父母親大多接受過現代教育，因此這一代的達悟人不太會說達悟母語，也不熟悉傳統的技能。                    |

(n=51)

們的來訪，高興的與醫師握手，並不斷的對著我們說：「台灣錢多多」(2003-B-3)。「台灣錢多多」是他唯一會說的國語，也是橫跨這兩個不同世代對台灣共同的想像。

現代性社會變遷的衝擊下，達悟人的認同也明顯發生變化。青壯世代經常充滿遷移來台的壓力與渴望，有著跟不上外在世界的焦慮。現年 48 歲的陳海成(No.1)，13 歲國小畢業即來台工作，19 歲因自殺未遂被送回蘭嶼，他共有五次自殺自殘的紀錄，精神醫學診斷為精神分裂症。他的弟弟海一談及這一代必須來台的壓力：

海一：最初他（指哥哥）來台時間也不是很長，在我記憶裡

面也不是做什麼好工作啊，不是在工廠裡面，要不然就是造林，砍樹啊、砍雜草啊。對於接觸台灣，這些就是起頭，造林是最起頭。

問：你覺不覺得你哥哥如果沒有去台灣，就安安靜靜的待在蘭嶼，他可能就不會有問題？

海一：會，可是不出去你又會停留在那個地方，原地踏步喔！我們生活也不能永遠停留在那個層面，土包子，也希望多看一點。他那時候去台灣喔，他一定跟不上，腳步跟不上是一種壓力。而且，現在跟你同輩的都出去工作了，你留在這邊，你也會不好意思的。(2003-13A-3)

1980年代環島公路、公車、水、電等現代化設施相繼在蘭嶼完成，電視機也逐漸成為家庭必備的用品。2000年左右的蘭嶼，幾乎家家戶戶都有電視機。在田野訪查中，我經常看到聽不懂國語的老人盯著螢幕哈哈大笑，或者年幼的孩子們躺在床上看電視，看電視成為達悟人重要的休閒娛樂之一。透過電視與廣告傳送出的訊息，無疑加深年輕人對資本主義消費習慣的嚮往。大眾媒體加上學校現代教育的影響，推動年輕一代達悟人逐漸認同現代生活的方式、標準與價值。表面上經濟與生計的改變固然是達悟人遷移台灣社會的主要動力，但背後更大的壓力來自於年輕一代對現代性生活的方式、標準與價值的肯定。對他們而言，到台灣本島去，是追求現代生活的重要途徑。這種長期社會變遷下形塑的個人認同轉變，則是加速他們遷移台灣的內在動力。

現年 32 歲的真翎(No.15)是另一個例子。她在 17 歲國中畢業後，即隨同學到台中鞋廠工作。問她為何要去台灣，她告訴我：

那種心情就是我們蘭嶼很無聊啊，國小到國中就這樣子，覺得鄉村很乏味，就一定要跑到外面工作。國中畢業學姐介紹，先去台中鞋廠做了一年，我就決定去台北。那時候蘭嶼

也有高中，以前是成功水產職業學校，但我四個好朋友不習慣在蘭嶼，全部跑來找我，走我們一起去台北，去闖那個世界。(2003-2A-10)

真翎 28 歲在台灣工作時，開始出現幻聽、抑鬱等症狀，精神醫學診斷為情感性精神疾病。2003 年初回蘭嶼養病，家鄉沒有壓力的環境，讓她病情獲得了暫時的穩定。但失業的她，卻擔心著自己的未來。她說：

真翎：如果都沒有工作，就這樣無所事事，喝酒，你喜歡這樣子嗎？讓自己有工作，不要跟那些酒摻在一起，我就很希望自己有工作，就是賺錢而已，我們的生活維持就是賺錢而已！還好現在蘭嶼在海邊資源豐富，山上海邊都有菜，要不然我們吃石頭算了，哪有錢過日子。

問：你現在還會不會想去台灣？

真翎：會啊，煩死了。都幾個月了，你總該看看外面的世界。你每天已經看膩了，那個石頭就是在那裡。  
(2003-2A-4)

2003 年 8 月真翎決定來台暫住台東姊姊家，極力尋找下一個工作機會，並且一直到 2005 年底，都沒有再回蘭嶼。真翎的生命際遇是田野中許多開始接受現代教育個案的縮影。這些眾多年輕的個案，在病情穩定後，仍然想回到「現代化」的台灣社會，充分顯示現代性社會變遷下他們面臨的壓力、渴望與認同的轉變。不斷遊移於原鄉與台灣之間，是開始接受現代教育達悟青壯世代的集體宿命，也是位於邊陲的少數族群被迫捲入現代性社會變遷的一種無奈的回應方式。然而由於上述所指出的達悟人遷移台灣的歷史特殊性，亦即他們與外界接觸較晚、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準備不足、不熟悉資本主義經濟邏輯等因素，他們在台求學工作的壓力，一般要比其他本島原住民更大。這些

特殊的歷史性緣由，促使這些第一代的達悟移民更容易遭受巨大的心理挫折，面臨著精神失序威脅的風險。

除了上述歷史性因素容易造成遷移來台的挫折外，那些經常面臨遷移壓力、渴望現代性的成就而充滿焦慮的當代達悟青壯世代，在遷移過程的前後，也遭受許多具體的限制與衝突，加深了他們的心理挫折。這些包括教育準備、職業經歷、文化衝突、親屬連帶、成就期望等面向。本文接下來就一一分析這些使他們的遷移經驗經常面臨挫折的因素，而這些因素仍是來自達悟社會所遭受現代性衝擊下的變遷。

### （三）教育：向上流動的憑藉或心理挫折的來源？

教育成就一直是少數族群、低下階層向上流動的重要管道。然而達悟青壯世代在遷移台灣、步入現代社會的謀生競爭之前，教育條件所能賦予的準備能力相對缺乏。1969年蘭嶼國中成立，一直到1990年合併原來的成功商業水產職校蘭嶼分班，1997年擴充為完全中學。亦即，九十年代以前，蘭嶼本島的教育體系只到國中，教育資源相當的匱乏。就學歷而言，近年來高中以上人口比例有相當大的進展，但仍與漢人有極大差距。國中以下的學歷高達49.5%，教育程度偏低使得來台從事基層體力勞動的人口占多數。<sup>15</sup>

達悟普遍的低教育程度、在就業市場的劣勢地位、以及社經地位的低下，也影響族人青壯世代的成就動機，限制他們對未來的期望。以趙懷光(No.3)為例，他從小學開始就有寒暑假在台打工的經驗，他的家庭環繞在母子兩人罹患精神疾病、叔叔自殺、妹妹先天性心臟病、父親酗酒、全家失業的陰影下。16歲時他開始出現幻聽、傻笑、跑去墳場等異常行為，醫學診斷為躁鬱症。2004年就讀蘭嶼完全中學的他，距離高三畢業剩最後一學期，他卻告訴我想休學到台灣工作：

---

15 2005年底蘭嶼鄉15歲以上之人口數為2,963人，學歷為國中以下者有1,467人(49.5%)，高中職肄有341人(11.5%)，高中職畢有788人(26.6%)，專科肄有58人(2.0%)，專科畢有99人(3.3%)，大專以上肄有76人(2.6%)，大專以上畢有134人(4.5%)。參見台東縣政統計<http://www.taitung.gov.tw/department/p3/12345/p3/2.htm>，查詢時間：2007年5月21日。

我想去台灣工作，那邊沒有人認識我，重新開始。我不想唸書了，在這邊也沒學到什麼東西，都是在混，我比較重視實質所學到。我想先休學和表哥到台北三重去工作，我以前暑假曾在那工作二十多天，賺了一萬七千多元。先到台灣賺錢，存一點。(2004-B-3)

當我勸他再熬四個月，好歹拿到高中文憑，再去台灣。他卻大聲回我：「我們這些都做勞動、粗工的人，難道也會看文憑」(2004-B-3)。這些達悟青壯世代普遍的結構困境，似乎已塑造他們的自我認同與對自己未來行動的選擇。

趙懷光所說的「在這邊也沒學到什麼東西，都是在混」，同時透露少數族群接受主流社會教育所產生的問題。九年義務教育與規定集體住宿的國中生活，所傳遞的是以漢文化為主的現代生活。學童在學校禁止說母語，學習漢文化為主的教材，這些都促使接受現代教育的孩童，逐漸遠離母體文化。加上早期蘭嶼因地處偏遠，學校師資普遍不佳，缺乏良好的學習環境，許多達悟中年人對學校的印象就是要做勞作、抓青蛙。

即使是原本在蘭嶼成績較好的孩童，當納入台灣以智育為導向、高度升學競爭的教育體制，也普遍經歷了跟不上別人的焦慮。這些少數能來台求學者，部分也面臨適應不良的問題。現年 24 歲的衫明(No. 37)，因為爸爸是牧師，國小畢業後就隻身到台灣某教會學校讀初中與高中。高中畢業後，在原住民加分的保障下，他進入北部某大學的宗教系就讀。離開了教會學校單純的環境，大學生多彩多姿的生活，反而讓衫明覺得不適應，他說：「去 Pub、KTV 能放鬆嗎？我很懷疑。」別人用電腦打報告，他卻習慣用手寫的，他說：「我的打字很慢，如果用打的不習慣，因為我接觸電腦的時候很慢嘛，上高中才接觸。」對大學生活的不適應，大二時因出現恐懼、害怕、睡不著覺等症狀，休學返回蘭嶼，精神醫學診斷為憂鬱症。他對我這麼解釋：

壓力是在那課業上面，我們就是高中成績沒有打好，老師在講什麼，我們聽不太懂，加上我參加很多社團，時間弄得很緊。我會覺得悶悶的。考試的時候會睡不著，想太多了睡不著，就一直會擔心。(2000-7B-15)

家裡開雜貨店現年 29 歲的小靈(No.39)，高三時在台出現異常徵兆，精神醫學診斷為躁鬱症，她的媽媽這麼告訴我：

她小學功課很好，得過台東縣兒童創作第二名，後來國中畢業就出去，到外面精神壓力大，讀台東高商住別人家又心理不平衡，加上她父親去世，可能是這樣才生病。病好的時候，她會哭說：我為什麼得這種病。(2004-5A-3)

當護士 Si-Ma 談到和她國中同班、現年 32 歲的慧珊(No.18)發病的歸因時，她認為是為了考公務人員，用功過度而生病的。慧珊的爸爸也說到女兒發病的經過：

她高中畢業以後，她半工半讀啊！她工作很勤勞，沒有休息過。她想半工半讀，但不順利。發病回來蘭嶼後，她天天看書，參考書就買了好幾千塊啦。她看書啊，晚上不敢睡覺，又說：一個男孩子在旁邊。(2004-5B-3)

1990 年代前這些少數能夠直接來台讀書的個案，基本上都是家境較好的個案。衫明、小靈、慧珊三個在求學與升學階段發病的年輕個案，他（她）們的父母都是現今達悟的中生代，亦即接受現代教育的第一代，因此能對現代教育抱持較為肯定的態度。不過受限於自身的條件，他們對於孩子的求學狀況並無法給予太多協助。絕大多數遷移到台灣的達悟青壯世代，是為了工作賺錢，而非繼續升學。他（她）們社會經濟的不利位置起因於教育成就低落，但是，教育成就低落又

與上一代低下的社經地位與邊陲的處境有關。

田野中這些 25-60 歲遷移到台灣的青壯世代，他（她）們的父母親大多數未接受現代教育，僅少部分受過日式教育，普遍的對於孩子進入現代教育制度的學習並不關心。這種不關心，涉及了兩個世代不同的生活方式與世界觀彼此差距所產生的代溝。一、這使得老一輩對孩子接受現代化教育方式，產生排斥、抗拒的心態，也影響了孩子教育資源的取得。二、他們大多沒有能力提供孩子在台教育過程必要的支持（無論在經濟或學習上）。三、如同前面提到的，貨幣價值進入蘭嶼也改變了老一輩的認知方式，他們重視孩子經濟資本的取得高過教育資本的成就，進一步造成這些在台受教程度較高孩子的壓力。

例如真翎(No.15)國中畢業後，便來到台中鞋廠工作一年，存了一年錢，原本想半工半讀，缺乏父母奧援迫使她放棄學業，她說：

一年級下學期我就沒讀了，壓力太重，我們是半工半讀，太遠了，工作、學校、租房子的地方都很遠，時間上的問題，又租房子，金錢上的問題，很多壓力，太累了。學費都自己付啊，父母親哪有在幫你，全部都靠一個人這樣啊！那個錢的方面，什麼都是要繳錢啦，壓力很大。才一萬多塊的薪水啦，我不曉得怎麼用，我真的沒有辦法支撐。(2003-2A-2)

休學後的真翎進入卡拉 OK 店當服務小姐，她告訴我：「你不知道很多原住民為了錢壓力很大，就去那種地方算了，所以才會去接觸那種場所。問題是那個地方本來就是不好的場所，所以才會學到的、看到的一大堆」(2003-2A-2)。進入卡拉 OK 店讓她的生活掀起了重大的波瀾，生病後的真翎只簡單的告訴我，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教育往往是少數族群能夠力爭上游的有利途徑，然而，早期蘭嶼教育資源缺乏與師資不良，都使得來台讀書的達悟人，在升學的路上走得並不順遂。另一方面，十多歲遠離父母親的庇護來台打拼，也加速他們與母體文化脫離，形成兩代間的代溝。大部分來台的青壯世代礙於

家庭經濟的不利處境，阻礙了他們繼續升學的可能。

#### （四）求職謀生中的挫折：來回遷移的底層勞動力

「沒有賺到錢」、「賺的錢根本不夠用」，這是在田野中最常聽到個案與家屬的抱怨。接下來我將分析達悟青壯世代在職業結構中的普遍處境，指出他們向上爬升的困難，以及這些經驗帶給他們的心理壓力與創傷。

##### 1. 被迫捲入台灣勞動市場的最邊陲

原住民的工作環境通常被形容為最「深」（礦坑、隧道）、最「高」（大樓鷹架）、最「遠」（遠洋漁船）、最「暗」（酒家、娼館）的工作情境。戰後隨著台灣經濟發展，原住民大量的填補了這些底層、邊陲的工作，並逐漸走向資本主義分工體系的一環。居住蘭嶼的達悟人相較於其他原住民遷移台灣的過程較晚，加上人口少，不容易累積社會資本，因此在就業結構與生活適應上，又比其他原住民處於更不利的位置。

1960 到 1970 年代，當台灣農業的勞動力逐漸轉向非農業部門，勞動方式較為辛苦的林業，便出現了林工難求的情況。在這樣內推外拉的過程下，不少原住民被吸入造林業，成為出賣勞動力的林班工人（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1989: 31）。1960 年代第一批赴台的達悟人，大量的在台東、屏東一帶山區的林班工作，從事山林勞動，填補了底層勞動的空缺。

1970 到 1980 年代是台灣工業部門進入外銷導向出口工業的主要階段，需要密集的勞動力。因此，台灣社會經濟發展帶動了周邊工業蓬勃發展，大量原住民投身於製造業與營造業兩大行業。七十年代初期，達悟年輕人開始離開林業成為運輸工人、捆工、建築鐵工、或水泥工。七十年代中期以後，年輕人又陸續成為工廠工人，進入紡織、染整、成衣、沖床、皮革、家具、電鍍、製鞋等部門。我們可以看到與早期林業同樣的現象，達悟年輕人所能進入的產業部門通常比漢人要晚十年。也就是說，當達悟年輕人開始進入某個產業部門時，這個

產業部門往往已經是台灣的夕陽工業（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1989: 32）。因此，許多高危險的建築與非技術性工作，大多數當時台灣年輕人不願從事的工作，也逐漸由達悟男性所替代。現年 34 歲，目前在原住民電台工作的達悟人歐斯，說到這樣的歷程：

五〇年代末、六〇年代初期台灣製造業才剛要起步，有一個外國神父叫丁松青，帶一批蘭嶼的青年到台灣，大部分都是先做林班，這是第一波的上來就業的人。緊接著就是台灣的製造業開始起飛，製鞋、罐頭工廠、加工業、製造業，那時候陸續更多年輕人開始投入到台灣的就業市場。七〇年代到八〇年代初期，製造業之後建築業開始起飛，大量的男孩子就往建築、板模工這些方向。(2002-B2-7)

從整體的職業結構來分析，達悟人遷移來台的時間比平地勞工與其他本島原住民較晚，我們發現從早期的林業到後來的製造業與營造業，第一代移民的達悟年輕人所填補的都是台灣經濟轉型最邊陲的位置。加上達悟人口少，社會關係不足，對於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學習起步非常晚，貨幣的使用與市場運作的邏輯都處於低度開發的狀態，這也限制了他們自行創業的可能。從達悟人近年來職業別的比例，我們也可以發現他們極少進入金融、銀行等商業部門工作，而成為大公司的管理階層幾乎是零，普遍缺乏專業、商業人才，職業別絕大多數仍為農漁牧業，<sup>16</sup> 自然不易創造向上流動的空間。

## 2. 不斷的在底層勞動市場橫向流動

吳玉琴(1992)針對 221 位在台灣工作的達悟年輕人進行研究，指出達悟年輕人大量外移，投入台灣的勞動市場，從事高危險的建築及

16 根據李亦園等(1990: 304-308)的研究，1978 到 1988 年這十年從事農漁牧業的就業人口雖有減少（由 1978 年 92.2 % 到 1988 年 76.6 %），但達悟人受限於偏遠地區的就業機會，絕大多數仍從事農漁牧業。

非技術性工作；外移人口以男性居多，教育程度集中在高職、國中；信仰以基督教為主，未婚者居多，絕大多數仍設籍在蘭嶼。這些青壯世代個案的生命史也顯示，他們幾乎都屬國小、國中的低教育程度，平均 15、16 歲來台，大多在同鄉、親人的引介下進入次級勞動市場或非正式就業部門。男性大多從事生產、操作、製造、營建、運輸等工作，女性則以工廠作業員、服務業的小妹居多。他（她）們從事的都是一些基層體力勞動，入行前大多未能透過學校或職業訓練所習得相關的技術，這類行業對技能的要求較低，雖然比較容易進入，但也容易頻換工作。因為缺乏技術的累積，使得這些個案大多只能在類似的職業結構中「橫向流動」。

現年 28 歲的陳安安(No.7)，精神醫學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父母失業，家中有八位兄弟姊妹，他排行老二，16 歲國中畢業時與部落的人一起來台工作，18 歲在台中搬家公司上班時，出現幻聽等症狀。生病八年，前後入院八次。出院後病況穩定時，他又會跑到台灣工作，大多從事鐵工、搬貨、捆工等臨時工，工作時間都不長，平均只有三至五個月，當自己覺得不對勁時，就會跑回蘭嶼，不斷徘徊在台灣與原鄉成為他這幾年生命的寫照。由於父親也是精神科收案的個案，安安的發病很自然的被醫護人員歸為家族遺傳的個案。但是，安安自己這麼解釋最初發病的原因：

安安：那時候是想太多。

問：想什麼？

安安：想到要不要換工作啊，找另一個工作，因為領不到錢，領到就是很久，還有有時候就是一天沒有吃幾餐。

問：一天都沒有吃幾餐？那你同鄉的人會不會照顧你？

安安：也是會，但是我不敢跟他們借錢，才會回來蘭嶼。加上，也聽到聲音。

問：在台灣就聽到聲音了，會害怕就回蘭嶼？

安安：對！就覺得很奇怪，怎麼會有這種聲音？

問：那個聲音都叫你做什麼？

安安：我看電視的時候，那個聲音就好像會責怪我。會一直想家裡的事。

問：家裡的什麼事？

安安：家裡的環境，心想說爸爸的病什麼時候才會好，因為那時候我在台灣，就是說很不放心家裡。(2004-26B-10)

2003年1月四度出院後的陳安安，病況暫時好轉，來到台灣與同鄉的人從事搬貨的工作。不料兩個月之後，有天他騎車不小心與貨櫃車相撞，住院了一星期，他的媽媽說：「警察說這種事故，對方沒有辦法付錢，他一個人在醫院，因為我們沒有錢去照顧。」車禍後丟了工作的他，回到蘭嶼，他告訴我：「因為工作丟了又車禍，心情很鬱卒，就喝酒，後來聽到聲音就又去住院。」2003年9月他第五度住進精神科病房，離他前一次出院，中間只隔了八個月。輾轉來台工作這麼多年，他都無法累積財富來改善自身與家庭的劣勢地位。他的媽媽則說：「他自己都難保了，也不會拿錢回家。」不斷的遊移在蘭嶼與台灣，因為沒有穩定的工作，以及固定的經濟來源，間接導致安安缺乏自信與自尊。

現年33歲的林茵(No.16)，是另一個例子。對台灣充滿幻想的林茵，國中畢業後本想即刻來台，因為擔心半工半讀、沒錢繳學費的壓力，她決定選擇不用繳學費的蘭嶼完全中學。直到18歲高中畢業來台工作，22歲在北部某家鞋店擔任店員時，出現幻聽、幻覺等徵兆。她的工作史，包括製造業與電子工廠的女工、鞋店的服務員與美食街的外場人員。她不甘心不斷的在既無技術，薪水又少的工作流動。生病後的林茵這麼告訴我：

我想唸護理獲得一技之長，但是以前都沒有相關的資訊，現在更不可能。范醫生跟我講說，你這樣的狀況，除了藥物以外，還是要靠自己安排你的作息。可是，現在的問題是，

我總是覺得一片的空白，因為你畢了業，最主要你沒有一技之長，沒有一技之長，你就會覺得空空的，就是人生一片空白那樣子。(2004-13B-27)

此外，底層勞動市場的共同特性：升遷機會小、工時長、待遇低、工作環境不良，無形中也加重這些來台打拼的年輕人的生活壓力。現年 30 歲的夏伊因經濟不景氣目前返回蘭嶼待業中，他談及前幾年在台工作的經驗：

價錢壓得很低，工作的時數很長。有時候晚上兩三點才下班。第二天照樣八點半上班，而且遲到也是扣薪水，不留情面的那種。一個月做得很累，薪水才兩萬初。加上現在租房子一個月要七千多塊，生活費根本不夠。(2004-5B-11)

或者，有些個案來台後，以打臨工的方式維持生活所需。這些資本主義產業後備軍，因為無法進入正式的僱傭關係，也無法獲得契約制度的保障。一旦遇到職業災害、意外事故，田野中的個案大多是自付風險。受制於移民與原住民雙重不利的身分，他們並無法在這樣的職業流動中，為自己掙得一席之地。這些在台工作而出現異常徵兆的 15 個個案中，有 12 個是未婚男性，也就是個案多集中在年輕的未婚男性。在 15、16 歲身心未成熟的情況下便投入台灣惡劣的勞動市場，父母又不在身邊，也間接的誘發了個案精神失序的可能。

### 3. 過客性的來回遷移與家屋改建

2003 年我隨馬偕精神科醫師每個月固定的家庭探訪，正遇到剛從台灣回家的白志鴻(No.4)，白志鴻國中畢業後，即隨姊夫在台灣鞋廠與製造廠工作。他告訴我們：「上一次去台灣，做一做老闆跑掉，11 月就回來了。景氣不好啊，因為都在裁員」(2004-18B-3)。2004 年去探訪楊洋(No.33)，原本在台灣做鐵工的他，告訴我：「因為家屋改建

需要人手，加上賺的錢太少，才剛從台灣回家幫忙」(2004-12B-19)。

類似白志鴻、楊洋這種來回遷移的模式，正是這些學歷不高個案的最佳寫照。相較於台灣其他的原住民族，居住於蘭嶼的達悟族是唯一擁有完整地理疆界的原住民。近年來由於全島經歷多次的家屋改建，達悟族人口遷移的模式，普遍呈現一種過客型移民的型態。亦即，他們的戶籍大多留在原鄉，來台灣大多為了工作、賺錢維持生計。由於父母多留在蘭嶼，家鄉的親人也發揮了實質牽拉的效用。

八十年代初，李亦園針對泰雅、阿美、布農、排灣、達悟五個族群的青少年研究就指出，他們有相當高的工作轉換率，在每一個機構的時間通常很短暫，達悟族中更換多者更高達十次(1979: 6)。此外，1990年前後到台灣工作的達悟人，多從事無保障的勞力工作，常以打零工方式賺錢，往往流動率高，平均三個月換一次工作(李亦園等1990: 387)。1999年原民會的統計資料也顯示，原住民離職原因前三名，以「季節性或臨時性的工作結束」最多，占21.5%，其次是「對原有工作不滿意，占18.1%，再其次是「工作場所停業或業務緊縮」，占14.4%，而其餘原因均只占6%以下。如果再細分族別來看，九族的原住民因「季節性或臨時性的工作結束」而離開前次工作者，以達悟族的35.4%比例居所有原住民之冠(表三)。為何頻換工作？個案林茵(No.16)就說到：「工作最久的是八、九個月，那最短的是一個月這樣子。(問：你為什麼都做不久？)要不然就是嫌薪水太少。要不然我已經習慣了做了一陣子，再回蘭嶼」(2004-2A-3)。

黃町峰(No.26)國中畢業後，姊夫帶他到桃園做瓦斯的工作。他的工作經驗包括彰化的牛仔褲工廠、三重的鞋廠、台中工地的板模工人。39歲在台灣工作時，開始出現恐懼、妄想等症狀，精神醫學診斷為精神分裂症。問他為何如此頻繁更換工作，他告訴我：「會不適應啦！主要因為同仁的關係，因為沒有熟人會不習慣」(2004-B-2)。2004年過年回鄉時，因部落的大船下水需要人手，町峰便決定暫留在蘭嶼。只是回鄉不到一年，2004年底，他又不顧家人的反對再度遷回台灣。

表三 離開上次工作的主要原因：按族別分(%)

|           | 季節性或臨時性的<br>工作結束 | 對原有工作<br>不滿意 | 工作場所停業或<br>業務緊縮 |
|-----------|------------------|--------------|-----------------|
| 原住民離職原因總計 | 21.5             | 18.1         | 14.4            |
| 族 別       |                  |              |                 |
| 阿美族       | 19.8             | 18.8         | 17.5            |
| 泰雅族       | 21.3             | 17.3         | 10.5            |
| 排灣族       | 25.9             | 17.8         | 13.4            |
| 魯凱族       | 14.5             | 21.9         | 14.4            |
| 布農族       | 21.8             | 18.0         | 11.0            |
| 賽夏族       | 12.3             | 21.1         | 13.4            |
| 達悟(雅美)族   | 35.4             | 20.6         | 11.1            |
| 卑南族       | 27.2             | 11.8         | 15.7            |
| 鄒族        | 21.1             | 14.0         | 5.8             |
| 其他        | 7.7              | 16.5         | 18.5            |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編印《民國八十八年台灣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頁63。

蘭嶼因地處離島，返家一趟交通費昂貴，通常年輕人返鄉一次，往往希望逗留較長的時間。加上有時遇到氣候不穩無法如期返台，或者3-8月飛魚季需要捕魚人手，以致因回鄉被迫中斷工作或失業，是這些收入不穩定的個案普遍的經驗。這無形中也誘發這些來台的年輕人喜歡選擇臨時、不受正式制度規約的工作。

遷移來台時達悟人轉換工作頻繁，除了主觀上對在台收入不滿意，也有的是在漢人社會遭受歧視、偏見，寧可頻換工作。或者，「非正式就業部門」的特性也提供他（她）們常換工作的客觀條件，經濟不景氣工廠倒閉、老闆逃跑、工程結束等也是年輕人不得不返鄉的原因之一。事實上，這些接受現代教育的世代，夾雜在傳統文化（蘭嶼）與現代社會（台灣）的雙重壓力下，使他們無法長期從事一項固定的工作。

長達數十年島內集體的家屋改建，也是迫使年輕人必須不斷的遊移在台灣與原鄉之間的重要原因。從1966年起政府補助興建的「示範住宅」陸陸續續在島上出現，到了1970年代後半更在《改善蘭嶼

山胞住宅計畫》推動下，企圖以現代國宅取代傳統住宅（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1989: 10）。政府對蘭嶼國宅的興建可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 1966 年至 1974 年，主要以每年 16 戶，在各部落原有傳統聚落外另覓地興建的方式進行。1974 年「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赴蘭嶼考察後，建議省政府加強改善蘭嶼鄉「山胞」住宅，於是展開第二階段 1975-1980 年的大規模改建。到了 1980 年代為止總共興建了 566 戶，此階段不僅改建的戶數增加、在不同的部落同時進行，更重要的是開始拆除傳統家屋，對部落帶來相當大的衝擊（張興傑 1998: 19-20；陳玉美 1995: 133-166）。

從 1966 年起分兩階段的國宅改建，每一戶約 12 坪大，達悟人住進不到五、六年，房子開始掉落水泥塊、鋼筋外露鏽蝕，許多房屋形同危樓。自 1994 年證實蘭嶼國宅是海砂屋後，達悟人以行動向政府求償，獲政府以每戶 45 萬元自行就地改建的方式處理。原蘭恩基金會執行長，達悟人董恩慈就指出：

近幾年來，衝擊蘭嶼就業市場最深的莫過於政府的海砂屋五年重建計畫，許多族人為了配合政府補給每戶 45 萬，不得不放棄原有的工作，來投入這個變更窮的重建計畫，本來族人的郵局存款就已經很薄弱，卻因這個計畫把一生的積蓄都投入在重建裡，家庭子女往後的教育經費來源和家裡緊急支出的問題將會是雪上加霜。這幾年也因這計畫改變了族人的就業型態，從事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的人增加。(2004: 1-4)

由於政府所補助的 45 萬元並無法建造一棟現代化的房屋，因此大多數達悟人必須在台灣工作自籌建屋經費，存了一點錢便買材料回蘭嶼蓋房子。2003 年見到個案真翎(No.15)與丈夫，兩人處於失業狀態，他們的房子是尚未完工的水泥房，真翎告訴我：

那個房子是自己去想出來的，沒有人教你們怎麼弄，那台灣

都要叫什麼設計師啦，繪圖啦，水電啦，我們除了電話啦要牽電話線，那個電表啦，才有叫外面的電信局，其他的都是我們自己去買的材料、砂子啊！政府補助我們海砂屋重建的經費根本不夠，蓋個地基都不夠了，蓋到一半就去台灣工作，賺到錢回來蓋這樣。(2004-2A-9)

在傳統的達悟文化中，住屋是個人社會地位的象徵。沒有結婚以及沒有建造房子是「不完全的人」，代表他們無法進入家屋發展的各個階段，因此住屋的興建也被視為男性權力的象徵，重建家屋的壓力，讓這群從事體力勞動來台打拼的年輕人，必須不斷奔波於台灣與原鄉之間，更難以開發個人的專長與累積技能，這也限制了他（她）們職業的選擇與向上流動的可能。

#### 4. 沒有辦法存錢？

父母離異多年的鄭齊國(No.11)，在 1980 年代晚期，18 歲從蘭嶼完全中學畢業後，便直接來台。22 歲在台中工廠工作時，因收入不多，經濟壓力大，開始出現幻聽等症狀。現年 27 歲的他目前在台工作狀況穩定，但因為收入不高，往返交通費昂貴，沒辦法存錢，也無法常常回家。他父親說到目前的狀況：

一個月兩萬出頭，他們自己的生活都不夠了，抽煙和房租費啊，光房租就要多少錢啊，還要基本生活費，還會剩多少錢。他很久沒回家了，這次部落小米祭也沒辦法回來，回家花費太大了。(2004-21A-6)

齊國際的際遇反映了這些低學歷、低技術的年輕人的窘境，他們出賣勞動力所得的薪資，難以負擔個人或家庭的生計。在台的生活開銷大，也讓這些薪資不高的達悟人，承受了極大的心理壓力。此外，蘭嶼與外界接觸晚且早期教育水準不佳，也限制了青壯世代達悟人對資

本主義的商業邏輯的學習。早期遷移來台的達悟人不但很難習得所謂「儲蓄」的美德，又欠缺理財能力，在台灣所賺的錢也沒有妥善的運用。個案江家力(No.47)的哥哥就這麼說：

我去台灣賺的錢沒有辦法存錢。我們那一代是第一屆國中畢業（1972年）去台灣，我去台灣沒有計畫，把這個錢好好的存，對我的將來有好處。沒有什麼計畫，就賺多少就花多少！我是開銷比較懂，什麼計畫存到郵局，沒有人教啊。  
(2005-36A-21)

學歷只有小學三年級，不識字的陳土楠(No.30)，曾隨姊夫到台中鞋廠工作，因為教育程度低，不懂得如何到銀行存錢，只能將賺來的錢，偷偷藏起來，他說：「我賺的錢都自己花。我不會寫字啊，會寫字的話到銀行那裡存啊。我不會寫字啊，沒有人幫我存，錢就自己藏起來」(2004-33B-6)。

這些接受現代教育遷移台灣的第一代，前腳走進台灣的現代化生活，後腳卻仍附著在父母親傳統生活的包袱中。在台灣他們必須應付少數族群身分伴隨的種種社經結構的不利位置，回到家鄉又必須兼顧照顧上一代的責任。這種「夾心餅乾」的處境，讓他們掙扎在傳統與現代的世代衝突中，徘徊在蘭嶼與台灣的雙重壓力下。現年 38 歲的海一，說到他們這代的共同處境：

成長過程中當然哥哥姊姊比較重要，他可以帶你，你可以被帶。可是爸媽就沒有東西給我們，所以我就會覺得說，你們台灣人的小孩真的很幸福，你們永遠可以有爸爸媽媽當靠山，可以被幫助。可是我們這代沒有很實惠的從父母親那邊收到一些，講難聽一點，就是好處；相反的是，我們還沒有成長，就要反哺了，就要對他們要照顧，對他們要付出。  
(2004-13A-22)

在遷移台灣的過程中，只會說母語的父母親，往往無法理解孩子在台灣所必須面對的衝擊。甚至，當貨幣邏輯改變了傳統老人的價值觀，金錢成為孝敬父母親的主要方式之一，反而形成另一股壓力。34歲在台唸書的美穗，就這麼說到這一代的壓力：

年輕人常被島上的老人家誤解說，你們在台灣有工作，為什麼還賺不到錢回來呢？他們沒有辦法把工作之外的生活必要的開銷加進去，所以都覺得你不可能是負債的，無形之中也給孩子很大的壓力。他們沒有想到說，突然被裁員的這一段期間內，孩子要怎麼過？他不可能向家裡要錢，那這些風險是島上的人完全想不到的，他們只會想到說，過年為什麼有的孩子會帶錢回來，但是我的孩子沒有帶錢回來？沒有帶錢回來的孩子，他會不好意思，其實很可憐的。(2000-B3-4)

達悟的傳統文化強調彼此共享與互惠，透過誇富式的宴請（如：房屋落成禮）來彰顯自身的社會地位。那些最早遷移台灣的達悟人，普遍缺乏私有財產觀念，也不善理財與儲蓄。許多個案來台後，往往把剛賺來的錢，用在大肆宴請或流連聲色場所。有的則是被資本主義的消費習慣所吸引，不但沒賺到錢，還積欠大量的債務。2003年剛出院返家休養的林茵(No.16)就告訴我她未來的還債計畫：

調整自己，就是這一年好好的把自己整理起來，再出去工作打拚。因為我信用卡的帳款都還沒有繳，要繳十幾萬啊。那個是累積、逾期的，譬如這個月的帳款是八千塊，我沒有繳，然後下個月你就又累積，那個利息累積，就變成……。所以要靠我拚命，每天都拚命賺錢還那個帳。(2004-13B-17)

這些達悟青壯世代來台闖蕩的過程中，大多數的受訪個案都是在類似勞動條件不良的情況下，不斷橫向的更換工作。加上對主流社會

的資本生產方式不熟悉，台灣生活開銷又大，使得他們出賣勞動力所得的薪資，並無法累積足夠的積蓄來達成他們的心願。理想與現實之間永遠無法跨越的鴻溝，往往是這些遷移來台的個案心理重挫的原因之一。

失業也是達悟的底層勞動者經常面臨的威脅，並帶來極大的心理挫折。妮妮的哥哥鄭自時(No.40)，五年前發生車禍後長期失業，太太帶著女兒與他離婚，開始出現精神失序的徵兆，目前在花蓮玉里長期療養。妮妮嫁給隔壁部落的呂健永(No.10)，健永的三個哥哥，大哥年輕時在台灣自殺，二哥呂國輝(No.8)在台工作時出現異常徵兆，三哥呂阿安(No.9)本來很正常，部落的人認為，是因為在台灣沒工作，回蘭嶼又長期失業，一天到晚閒晃才開始出現怪異的行為。兩人的精神醫學診斷都是精神分裂症。因為沈重的家庭壓力，健永三年前也被診斷為憂鬱症，在妮妮的世界中，哥哥、二叔、三叔、先生共四位親人被納入精神科的診斷中，她說到自己親身的觀察：

我們這種病患機率太大了，一個島嶼就那麼多。經濟不景氣呀，然後再加上原住民的身分，他們沒有辦法做到比較中階層的工作，比如說在工廠啊……工廠又解雇……倒閉的話你就沒頭路了啊！回來也有壓力……每天無所事事，不然就在那邊喝酒，看看家裡也沒做好（筆者註：指家屋改建），那個心，再加上又沒有工作的話，精神上就算再怎麼有能耐的人，也沒有辦法去承擔。（2004-27A-5-6）

晚進台灣勞動市場的變化，使達悟人青壯世代來台的邊陲職業處境，又面臨雪上加霜的失業挑戰。1989年開始政府為重大公共工程引進外籍勞工，三十多萬合法與非法外籍勞工湧進台灣製造業與營造業，對原住民形成強大的排擠壓力。營造業、製造業大量引進外勞，剝奪了依靠營造、建築為生的男性達悟人的工作機會。表四顯示，近十年來其他原住民族的失業率遠高於台灣一般民眾，而達悟族的失業

表四 達悟族、其他原住民族與全國一般民眾失業率比較(%)

| 分類別    | 年份    |       |       |             |             |       |       |
|--------|-------|-------|-------|-------------|-------------|-------|-------|
|        | 1995年 | 1997年 | 1999年 | 2001年<br>3月 | 2001年<br>9月 | 2002年 | 2003年 |
| 一般民眾   | 1.79  | 2.45  | 2.84  | 3.89        | 5.26        | 5.02  |       |
| 其他原住民族 | 4.22  | 4.71  | 7.55  | 9.24        | 14.86       | 8.37  | 9.64  |
| 達悟族    | --    | --    | 9.02  | 14.63       | 12.41       | 9.86  | 12.50 |

資料來源：筆者依下列資料整理所得：

- 1.《台灣原住民生活狀況調查報告》，1998: 136-137。
- 2.《民國八十八年台灣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1999: 128-129，表 13。
- 3.《民國九十年上半年台灣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2001: 29，表 3-18。
- 4.《民國九十年下半年台灣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2001: 28，表 3-17。
- 5.《民國九十一年台灣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2002: 32，表 3-20。

率又比其他原住民族高出許多（2001年9月除外）。以2001年3月為例，台灣一般民眾的失業率為3.89%，其他原住民族失業率為9.24%，而達悟族的失業率高達14.63%。達悟青壯世代遷移來台謀生的前景，似乎更加黯淡。由此而來的心理挫折，也進一步加深對高比例精神失序現象的衝擊。

### （五）文化衝突：族群接觸下的憤恨與創傷

文化衝突的先決條件是兩個文化有所接觸，而達悟人從食、衣、住、語言、姓氏、喪葬等整套的文化設計，基本上都與漢文化有極大的差異。本文這些青壯世代的個案，在老一輩達悟傳統文化的薰陶下成長，同時也接受現代教育的洗禮，來到台灣以漢文化為主的漢人社會，他們最先必須面對傳統文化所帶來的挫折與壓力。七十年代時一般大眾對蘭嶼所知有限，大眾媒體片面的報導，使得「丁字褲」成為達悟重要的文化表徵，許多來台達悟人普遍都經歷過「丁字褲」所帶來的不愉快經驗。現年34歲的美穗就告訴我：

七〇年代末吧，蘭嶼在媒體上曝光的機率也不是那麼很普遍，只知道有一群穿著丁字褲的一群人。他們會問我一些問題，比如：妳們那邊會用什麼錢？或是妳可不可以把妳的裙子掀起來，妳裏面穿的是丁字褲嗎？我只覺得我碰到一群很

可笑、很無知的人。(2002-B3-13)

除了丁字褲，原住民喜歡喝酒、嚼檳榔的刻板印象，也同樣的作用在他們日常生活的互動中。有些不喝酒的達悟人，來台後當明確的表達自己不會喝酒，卻被人譏笑，「原住民不是應該要很會喝酒嗎？」外觀上黝黑的皮膚、鮮明的輪廓，有人三番兩次被警察當成「非法外勞」。此外，到了閩南人為主的漢人社會，在工廠、工地的工作情境，不會說台語的達悟人也成為他人嘲笑的對象，真翎(No.15)說到她當初在工廠受到的歧視：「我聽不懂（指台語）就算了，他們就會這樣刺我說，在台灣這麼久了，連台語都不會講」（2004-2A-3）。這些文化的差異，都是原住民進入漢人社會日常生活容易引發衝突的導火線。有時又因為身處在底層勞動市場，反而成為接近幫派、違反法律的根源。以在台發病的陳海成(No.1)為例，他曾因在台盤纏用盡而與朋友結夥搶劫，由於他負責看門，因此進入監獄服刑七年。海成的弟弟這麼說：「我們這邊小朋友出去什麼都不知道的很多，很容易接觸到混幫派的那些人，因為那些混幫派的大部分都是在工廠裡面的。他們就是在工廠裡面接觸到那些人，都是工廠裡頭，接觸到社會層次比較低的人」（2004-12B-30）。

當年 20 多歲的陳海成，隻身來台找工作，工作沒找到，錢卻花光了，因此鋌而走險與人結夥搶劫。

問：為什麼人家叫你去搶錢，你會跟著去？

海成：那時候找工作，找了一個禮拜，找不到工作，身上還有錢不敢花，就乾脆跟他們在一起啊！

問：他們是在哪裡認識的？

海成：他們是我以前的同事！其他的我不認識！是宜蘭那裡做漁網的同事！

問：他們就說要去搶劫，然後你也說好？

海成：對！因為我身上沒有錢，也找不到工作，所以想一想

乾脆跟他們一起！啊，結果就被抓了。

問：那被抓的時候你有沒有很害怕？

海成：當然會害怕！爸爸媽媽也沒有來幫你。那時候沒有錢啦！

遷移台灣的第一代達悟人，大多位於勞動市場底層的不利位置。身處在惡劣的工作環境，年輕達悟男性在族群接觸的過程中，也特別容易與人發生爭執與肢體衝突。被打、被騙、混幫派、違反法律，是許多達悟男性來台灣工作的普遍經驗。在衛生所登記的個案中，許多男性個案（如：No.1, 17, 21, 33, 41, 46）都有與人衝突或被打的經驗。

「在台灣被流氓打的」是部落的人對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的家進(No.17)、維凱(No.46)之所以變得不正常的普遍歸因方式。現年 42 歲的維凱，國中畢業後隨同部落的人一同來台工作，曾有無故被人追打的經驗，從台灣返回蘭嶼後，開始疑心病加重，他的妹妹這麼告訴我：

他大概 26、27 歲的時候，就變得不對勁了。那時他在高雄工作，好像被人追打，自己醒來的時候已經是在甘蔗園裡面。從台灣回來後就變得疑心病很重，喜歡獨處，脫離人群，還說我大嫂煮飯會下毒。（2005-30A-10）

家進 17 歲國中畢業後，本來被保送軍校，來台一星期，在路上被不良少年毆打，害怕的他便放棄軍校生活而回到蘭嶼。他的哥哥說：

他國中畢業後就保送軍校，那時候我們家人聽到的時候都反對他，可是他還是要去。才去一個禮拜就給人家欺負。因為他第一次出社會，所以還不了解台灣的生活，他嚇到的，就想辦法要曉學，就沒有去好好讀海軍陸戰隊。（2003-9A-18）

回家後的家進，因為蘭嶼沒有工作機會，又隨著同部落的人，一

同到桃園鞋廠工作。家進 20 歲在桃園某家工廠工作時，開始出現嚴重幻聽、幻覺等症狀，被家人帶回蘭嶼。八年前，35 歲的家進又隨哥哥來台，住在台東的妹妹家，他原本想留在台東找工作，不料工作沒找著，反而被人打到內出血，送進醫院緊急開刀，他的哥哥說：

我們住妹妹的家，弟弟一直想在台灣找工作。想不到老闆都不要他這種的啊。後來住在上面的鄰居跟他們一起喝酒，我弟弟喝醉了之後就這樣鬧，……把我弟弟打得很嚴重，後來胃出血，很痛苦，我弟弟真的很可憐，我在想為什麼我弟弟被打成這個樣子，都沒有人去幫他。開完刀後，我就把他轉到精神科住了一個星期。(2003-9A-20)

田野訪談中發現，面對日常生活因文化差異產生的人際衝突與怨懟，這些來台的達悟年輕男性解決衝突的方式，仍承繼了既有文化的慣行。陳國鈞(1955)從事蘭嶼社會組織的調查指出，達悟人並無酋長、頭目統治的政治組織，也不依靠法律制度維持社會秩序。衛惠林、劉斌雄(1962)提到達悟部落間衝突的解決模式，先由社中老人會商，再由中年人組織戰鬥，戰鬥武器以棍棒及石頭為主。傳統達悟人的衝突，是透過不斷的威脅與挑釁做為戰鬥的表現。若有兇殺案發生，通常兇手會立即逃往深山，被害者的家屬大聲咒罵殺人兇手和他的家人，並且召集自己家人及村內親戚，前往仇家燒毀家屋。傳統秩序的維持主要是透過文化規範而不是法律規範，透過傳統解決紛爭的方式，也強化了部落內親屬團體的關係。而這種依文化慣習而來，情緒高張的表現方式，也成為達悟男性解決衝突與舒緩憤恨的方式。<sup>17</sup>

這些遷移台灣的達悟青壯世代，身上仍承繼著傳統文化慣習解決紛爭的方式，面對不同社會文化的衝擊，很容易發生互毆、打架的經

---

17 在田野觀察中，達悟人在傳統喪禮驅除惡靈的祭典儀式中，以及反核活動所跳的驅除惡靈的舞蹈中，所有參與的成員都處在一種極高張的情緒狀態，類似的觀察也可參見李亦園(1960)。

驗。而且在漢人社會與人發生衝突後，他們並無法尋求既有的部落連帶，成立復仇團體尋找仇家報仇。這些在台遭人欺侮卻無法洩恨的憤怒，也成為某種發病的壓力源。例如，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的楊洋(No. 33)，曾在卡拉OK店無緣無故被人打到腦震盪，他大哥這麼告訴我：

流氓打一打就找不到人。我不會講他生病，他不是真的生病，是被人家欺負的，是別人傷害他的。我還要你去協助他去回報這些人，可是這些人也找不到。之前這個人長得很帥，家裡幾個最棒的。自從在台灣被打了一直在掙扎，就是一一直在煩，他想去報復。他一直待在這邊，也沒錢賺、走來走去走投無路、想來想去就喝酒、就搵煩（筆者註：台語音）呢！（2003-8B-3）

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的李強(No.21)，他的弟弟也認為他所出現不正常的症狀，是在台與人衝突後的結果：「他年輕的時候在台灣比較衝，和人家很容易起衝突，就是被打。所以他是跟人家起衝突被打，才會產生那種幻覺」（2004-19B-31）。

來台後身處異鄉的達悟人，身處於底層勞工與原住民的雙重不利身分，很容易成為不良少年欺侮的對象。在台灣社會，由於缺乏既有部落的連帶，被人欺侮後並無法循著既有的文化慣行，尋找仇家報仇。無法洩恨的憤怒，間接的成為某種壓力源，精神失序便成為心中無法洩恨、怨懟與不滿累積後留下的心靈創傷。

#### （六）社會支持的弱化：遷移與傳統親屬連帶

達悟語的家族是"asa so inawan"，"asa"的意思是表示一個，"inawan"是一口氣息，也就是呼吸，引申為生命的意思，所以"asa so inawan"是指一群人起源於同一生命（謝永泉 2004: 3）。家族的範圍主要由己身向雙系等距展開的親屬團體所組成，關係最親密的親屬是同胞的兄弟姊妹及配偶，再往外推展即是父母兄弟姊妹的子女及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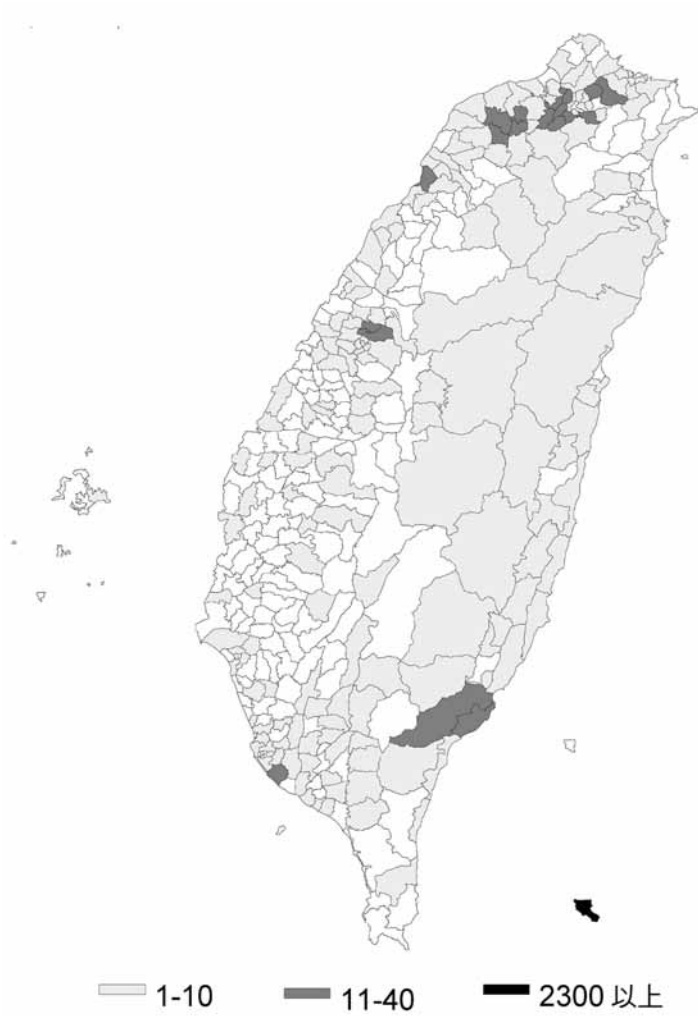
偶，這個親屬團體稱為"zipos"，該群體向心力及凝聚力極強（李亦園等 1990: 410）。

同一個"zipos"的成員彼此互動頻率極高，例如婚喪喜慶、建屋造船、捕捉飛魚時，"zipos"的成員是主要幫手，此外"zipos"成員也有照顧彼此子女的責任。這種"zipos"所延伸的人際支持網絡，使得早期來台就業的達悟年輕人，主要靠在台灣的親戚與同鄉的網絡，以母雞帶小雞的方式，透過人際遷移網絡留在台灣生活、工作，形成一股「集體性就業模式」。同村的親朋好友彼此邀約，或一個拉一個的在某工廠一起工作的情形，成為達悟人移民都市的典型模式。42 歲的山如，談及她的經驗：「我們是一群人，一群人就不敢欺負啦！就是很早出去，跟人有接觸，講話又比較婉轉，他們就比較不會欺負」（2004-2A-3）。36 歲的安依也說到：「在一起比較好，比較有安全感，同族的一起比較安心，遇到事情大家一起分擔，有什麼事情大家可以一起去處理，自己出去的話難免會被人家欺負」（2004-2A-3）。

這種「集體性行動模式」在台灣社會所引發的社會、心理癥結，也引發了正、反兩方不同的評價。一些研究者指出都市原住民自行隔離的現象，影響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及行為態度涵化於主流社會的程度，使得文化整合不佳、與其他群體的社會距離增加，造成原住民難以整合到大社會（張曉春 1974: 20-21；吳豪哲 1988: 95）。但也有人認為，前後期移民和原居地親朋好友所組成的移民網絡，在後續移民謀求住所、職業、適應移居地生活及人際關係時，層層的網絡聯繫通常扮演了一大助力（傅仰止 2001）。

根據我的田野資料，這種親人、部落族人所形構的集體性行動模式，大多提供個案最初來台找工作的跳板，以及初期生活上的協助，如：一起租屋、發洩情緒、生活上的相互照應。由於達悟的人口很少，遷移來台的歷史很短，遷移人口呈現年輕化，以及分散全省各地的多核心聚居模式（圖一）。<sup>18</sup> 既有"zipos"所延伸的人際網絡，主要

18 根據原委會 2001 年全國各縣市原住民族群人口統計表，遷移來台的達悟人由於人口少且多分散在全台各縣市，以當年的人口分布為例，基隆市 22 人，台北市 77 人，桃園



圖一 2001 年達悟族在台人口分布圖（單位：人）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http://www.apc.gov.tw/upload/govinfo/aps\\_/9011/aprp5802.htm](http://www.apc.gov.tw/upload/govinfo/aps_/9011/aprp5802.htm))，查詢時間：2006 年 2 月。

縣 149 人，新竹市 10 人，新竹縣 37 人，苗栗縣 16 人，台中市 40 人，台中縣 78 人，彰化縣 26 人，南投縣 25 人，雲林縣 10 人，嘉義市 3 人，台南市 9 人，台南縣 16 人，高雄市 61 人，高雄縣 43 人，屏東縣 46 人，宜蘭縣 21 人，花蓮縣 27 人，澎湖縣 2 人。呈現多核心且分散的聚居模式。[http://www.apc.gov.tw/upload/govinfo/aps\\_/9011/aprp5802.htm](http://www.apc.gov.tw/upload/govinfo/aps_/9011/aprp5802.htm)，查詢時間：2006 年 2 月。

是透過傳統生計、儀式祭典、食物的交換與分享等，凝聚彼此的互動。這種傳統部落中親人、族人"zipos"所延伸的社會支持網絡，在台灣缺乏得以持續運作的機制，在漢人為主的台灣社會已明顯的弱化，並無法有效的形成保護機制。在缺乏支持與庇護的情況下，使得高比例的精神失序個案集中在未婚，且半數以上的個案是在台無依的情況下發病。

黃町峰(No.26) 18歲國中畢業後隻身來台工作，30多歲在台灣工作時出現幻聽等症狀，他自己這麼說到在台發病的情況：「剛開始是聽到聲音，會覺得很害怕，連騎摩托車都會覺得怕。感覺在台灣時大家都在講你的壞話」(2004-B-5)。

林茵 18歲(No.16)在蘭嶼唸完高職後隻身來台，23歲在台開始出現幻聽，她說到當時生病的情況：

我是工作的關係啊，我受不了同事的打擊啊！因為老闆會罵人說我沒有在工作，只有在領薪水，其實我有在做，只是我另外一個同事一直佔便宜就對了。我就很沒有信心，會很恐懼，像是有人要害你。很無助啦！就沒有人幫助你、救你這樣子。(2004-13B-13)

現年 25 歲的小柔(No.44)，國中畢業後嚮往台灣的生活，因此不顧家人反對，來台進入可以半工半讀的高職建教合作班。高職畢業後，她留在台灣工作。22歲時出現幻聽、幻覺，常會看到各種血腥恐怖的畫面，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小柔談及發病的原因：

我本來在工廠工作，後來想轉行當廚師，就到餐飲業。我在廚房工作時，有個廚師很討厭我，常常嫌我動作慢。後來工作了兩個月，他就無緣無故把我"fire"。我一直在想到是我那裡做不好，會睡不著。後來就會聽到聲音或是看到很恐怖血腥的畫面，我才打電話給媽媽……。

現年 43 歲的家進(No.17)，20 歲在桃園工廠工作時，出現異常的行為（自言自語、指揮老闆、任意摸他人的手等），而由哥哥、父母親來台接他回家。說到當時在台的情況，他告訴我：「在台灣就有聽到，回蘭嶼就不會。這是以前的事，那個鬼很多啊，很多在害啊，就知道那個自己的身體，就是遇到鬼啊。那個鬼很厲害，那個鬼很厲害」（2003-B-8）。

沒人知道家進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倒是家進的大哥回憶起當時來台的束手無策，談到一半忍不住哭了起來：

打電話的人說你們買台東往高雄，高雄再到桃園，我就在那個車站等你們，結果想不到去的時候都找不到人，……到那邊又不熟，也不會坐車。他們已經帶弟弟去醫院打針，他就迷迷糊糊的躺下去了，聽到我們的聲音就趕快起來，全家都一直哭，弟弟怎麼變這樣，我們也沒有錢不敢讓他住院。（2004-9A-10）

林仁清(No.41)國中肄業，17 歲時隨同部落的人來台，24 歲時在台中工廠出現異常行為，當時他大哥在台北工作，大哥這麼說到他的狀況：

第一個是文化差異，第二個是可能不了解台灣社會，你們講的番仔，對山地人輕視，變成他就比較內向。後來他到台中在工廠做事，那個理髮廳在拉客的三七仔，會拉你，一去誤會，語言又不通，人家就欺負他，變成他內心差異化。加上本身內向又不善於言辭，他比較獨來獨往，到後來他個性就越來越封閉。（2003-10A-18）

從廣闊的大自然來到台灣複雜多元的環境，擠身於狹小的公寓，人與人正式的互動取代傳統部落"zipos"所延伸的人際支持網絡，都讓

這些年僅 15、16 歲遷移來台的個案，一旦遭受挫折，很容易產生沒有安全感、退縮的心理。在他們遷移台灣的過程中，父母親大多是缺席的，尤其早期電話不發達，父母輩未受國民教育，親子間亦無法透過書信往返聯絡。真翎(No.15)就說到自己一個人在台的心境：「我很想念家鄉啊，在外面還是很想念。因為你還沒有到可以很獨立，你會一直想念家，說家裏怎麼樣了，跑了那麼遠，還要隔一個海，還要坐飛機，然後一直想，還是想回家」(2003-2A-9)。

世代之間的代溝，使得同一代的兄弟姐妹代替父母親的角色，或者以血緣、姻親為主，擴散出去的家族連帶網絡，成為個案在台灣主要的支持系統。在台灣有親屬網絡的支持，會讓某些個案發病後仍能順暢的遊走於蘭嶼與台灣。但大多數個案都是在家族連帶與社會支持網絡不足的情況，一旦遇到工作或學業上的挫折，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特別容易誘發社會心理的適應問題。

### (七) 雙重束縛：個人的成就期望與集體的結構困境

傳統達悟社會是個講求個人表現的平權社會，相當不同於貴族、首長制的排灣、魯凱族等。達悟部落中並沒有統一權威的社會領袖，依不同性質的公共事務選拔出不同的社會權威，包括：部落長老、漁團領袖、復仇戰鬥領袖、財富領袖、技術領袖，個人的聲望與地位並非先天繼承而來。因此，在達悟傳統文化中，如何凸顯自己的後天成就成為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個人身處在這樣的社會中，必須依照自己的品德、技術、才能，或舉行盛大的家屋落成禮及新船下水禮，透過個人後天的努力提高自身的社會地位。

1960 年代之後，當貨幣的力量開始滲透到蘭嶼，貨幣價值開始取代傳統社會的價值，成為衡量個人成就的最重要指標。這也使得來台的達悟人容易陷入一種雙重束縛(double-bind)的關係中。一方面，強調個人成就的達悟文化，無論來台工作或讀書的年輕人都想積極的達成個人成就。另一方面，對少數族群不利的結構，使他們無法憑藉自身的努力取得成就。對於高度重視個人成就的達悟人而言，這往往是

心理挫敗的主要來源。

分析上述個案的生命史，這些擁抱並接受現代性的生活標準，年紀輕輕就來台打拼的個案，幾乎絕大部分都無法有所積蓄，有的甚至欠錢或留下信用卡債務。但弔詭的是，這些在台闖蕩多年，來台發病後被送回原鄉的個案，台灣依然還是他們夢想的天堂。在大多數個案的訪談中，他（她）們對台灣現代社會的嚮往，並不因為在台經歷種種挫折，而所有褪色。加上電視普及後，從媒體與偶像劇中所接收的訊息，也誘發這些個案對資本主義成功角色的想像（如：大老闆、大明星等），台灣成為開始接受現代教育的青壯世代積極認同的方向。然而，少數族群的歷史宿命與不利結構，普遍限制了他（她）們爬往現代社會成功的階梯。在現代性的變遷與矛盾下，一些年輕的個案在台發病後，仍來回游移於台灣與蘭嶼之間，不斷深陷於理想與現實雙重束縛的困境中。

現年 28 歲的陳安安(No.7)，16 歲來台，18 歲在台發病，前後進出醫院八次，來台多年並沒有任何積蓄。2004 年回蘭嶼養病的他，這麼告訴我：「覺得在台灣比較好，好很多。交通或者是便利。怎麼講，反正是比這邊的生活繁榮。在這邊你都看不到那種什麼商業大樓」（2003-B-10）。

現年 33 歲的林茵(No.16)，18 歲高中畢業後來台工作，23 歲在台發病，在台灣工作多年不但沒積蓄，反而信用卡欠了十多萬。她始終不甘心留在蘭嶼協助家人經營雜貨店，這幾年她不斷的告訴我想來台灣：

蘭嶼的話是自己的家嘛，頂多是這樣子而已。在台灣比蘭嶼好很多，就是蘭嶼沒有的，台灣都有啊！很多賺錢的地方啊，可以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啊！要不然就像旅遊那種，還有資訊也很好！在這邊沒有錢啊，所以要去台灣賺錢，因為在這邊沒有工作啊（2004-2A-3）。

現年 53 歲曾任議員的于順發(No.20)，在一場嚴重車禍後，一度被醫師宣告為植物人，在太太細心照料下逐漸康復。車禍後長期失業，加上當時太太為了生計必須到台灣打工，留他獨自一人在家，而後逐漸出現不斷撿垃圾的異常行為，被診斷為器質性精神疾病。久居蘭嶼的他在 2004 年時告訴我，未來計畫是想到台灣。

于順發：我自己的身體現在是殘障、一段時間等身體養好再講、想再找工作。

問：想在台灣、還是蘭嶼工作？

于順發：我想去台灣，這裡沒有錢賺！能有什麼收入？除了種種地瓜、幫人放龍蝦網、沒有錢哪來的龍蝦網。  
(2004-2A-3)

現年 47 歲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不識字的陳土楠(No.30)，曾隨姊夫在台中鞋廠工作。2005 年底開始在車行擔任臨時工的工作，雖然每天工資只有一、兩百元，他還是覺得到台灣工作比較好：

陳土楠：呃，我是因為錢不夠，那時才去台中工作。

問：如果你有錢你還會想去台灣？

陳土楠：想啊，可以上班做鞋子，我以前是做鞋子的啊。這邊（指蘭嶼）的錢不滿意啊，很少喔。在台灣有一萬多呢，一個月一萬多。(2005-33B-23)

現年 43 歲的家進(No.17)，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20 歲在桃園鞋廠工作時發病，生病後回蘭嶼已經 20 多年了，來台多次被打的他，說到台灣：「我喜歡台灣，因為我們這邊沒有工作沒有錢，這邊蓋房子也沒錢，捉魚也沒錢。台灣比較好，比較有錢」(2003-B-14)。

現年 38 歲的李強(No.21)，小學畢業後來台，八年前在台開始出現異常症狀。他的弟弟認為哥哥在台灣對病情較有幫助：「如果是在

台灣的話，是還比較好一點，因為他有工作可以做嘛，就不會說去想那麼多。在蘭嶼沒有工作，然後又沒有出去找工作，除了釣魚之外，還有什麼？所以說很不好啊！」(2003-8B-24)。

2000年我第一次隨醫師到蘭嶼訪視個案陳土楠(No.30)的媽媽，一位60多歲僅會說達悟語的老婦人，她透過護士翻譯告訴我們：「我兒子很想去台灣工作，可是沒有錢去(2000-B-10)。」老婦人滿臉都是對兒子的擔心與掛念。田野中這些成長於接受現代教育的個案，返回蘭嶼病情穩定後，通常還是想回到「現代化」的台灣社會。這個與世隔絕的小島，1960年代之後快速的被席卷入台灣經濟體系的勞動分工中。這些成長在傳統與現代世界接軌的達悟青壯年，遷移已不光是經濟誘因的需求，無論求學或工作，台灣已成為走向更好世界的唯一途徑。分析這些在台發病個案的生命史可以發現，這樣的想像並沒有因為他們在台被毆、欠錢、挫折、精神失序而有所褪色。

## 五、結論

本文將達悟人精神失序現象視為當代少數族群面對現代性衝擊，所產生的一種多重社會受苦經驗。在方法上以紮根式的民族誌，進入生命敘事探究其個人主觀的感受，輔以歷史文獻觀照變遷中的生存處境，以理解達悟人獨特精神失序的歷史、社會根源。以「社會受苦」做為一個啟發式的概念，提供本文的經驗分析幾個重要論點：第一、社會受苦的分析角度有助於我們意識到，基因研究取徑的不足與限制。1950年代之後，生物醫學的範型對精神醫學的影響日益擴大。在台灣，隨著分子生物學的發達，九〇年代之後，基因研究逐漸成為台灣原住民高比例酗酒、精神失序等健康議題的重要研究取徑。一方面當某個族群在基因上被標定為具有風險，就很容易形塑出一個申請研究資源的管道，這或許是近年來原住民健康議題的基因研究顯著發展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達悟青壯世代在晚近二、三十年間發生精神失序的比例大幅增高，反映出不易察覺卻影響深遠的問題，亦即處在

快速社會變遷的過程中，一個傳統原住民社會結構瀕臨解組、導致迷亂的現象。本文無意直接挑戰基因論述的生物成因，而是透過達悟人的個案研究去反省，如果研究者將研究焦點與資源分配過度偏重在基因面向，不但會讓我們忽略原住民健康議題背後的結構性癥結，也無法提供對症下藥的正確處方。我在田野中也發現，從基因角度理解精神失序，在達悟人間似乎已逐漸產生某種自我污名化的負面效應，這一點有待後續的研究。第二、基因研究將精神失序的痛苦化約至分子層次來理解，既不重視行動者的疾病受苦經驗，也不涉及人類疾病和苦難的社會起源與結構因素。社會受苦的概念有助於我們在經驗分析上連結個人與結構，不僅強調疾病的主觀感受與意義建構過程，也重視形塑疾病意義的社會歷史力量。這可以幫助我們跳脫僅從個人角度理解疾病的限制，凸顯出疾病受苦所具有的社會性。最後，社會受苦概念提供我們一個整體宏觀的分析視野，而非將疾病的受苦窄化成幾個可測量的變項，幫助我們掌握達悟人精神失序現象的社會面向，釐清彼此複雜的互動因素，提出具有社會學想像的解釋。

本文主要研究最早開始接受現代教育的第一代達悟人，亦即具有遷移來台經驗的青壯世代，分析來台求學、謀生等過程中所遭遇的困境與挫折，並且探究結構性、歷史性的緣由。

六 年代之後，經濟壓力、生計維持是達悟青壯世代進入台灣本島社會的主要動力。移居到台灣，也等於走進資本主義的現代生活。然而，從整體的職業結構分析，可以發現第一代的達悟青壯世代移民，大多填補台灣經濟轉型中最邊陲的勞動位置。低學歷與缺乏技術，使得這些來台的達悟人大多只能不斷地在底層勞動市場進行橫向流動。更換工作頻繁、重建家屋的壓力、以及短期過客般地來回遷移於原鄉與本島之間，這些都使得這群從事體力勞動為主的達悟人，無法長期開發個人的專長與累積技能，因而限制了職業選擇與往上流動的機會。升學受挫、存不到錢，對於強調個人成就的達悟人，更容易加深心理壓力。相較本島其他原住民族，達悟人口很少、遷移來台的歷史短、在台人口呈現年輕化與分散各縣市多核心的聚居模式、以及

傳統"zipos"親屬關係所延伸的人際支持網絡在台灣明顯喪失等，這些因素都使得來台的達悟人生活在社會支持不足的情境。發病的個案有四分之三集中在未婚、半數以上是來台後處在無依的情況下逐漸出現不正常徵兆，這些都具體反映了上述遷移過程的受挫經驗與精神失序的密切關係。

經濟因素固然是達悟年輕人遷移台灣本島的外在動力，但是這些接受現代教育世代遷移台灣的心理挫折感，同時反映他們的認同逐漸朝向現代的生活方式、標準與價值。本文中分析這些平均 15、16 歲開始就來往於蘭嶼原鄉與台灣本島升學或工作的青壯世代，他們絕大多數即使來台闖蕩多年，幾乎都沒有積蓄，其中有人甚至經常捉襟見肘，或者留下大量的信用卡債務。但弔詭的是，對這些在台發病後被送回原鄉的個案來說，台灣依然是他們夢想所寄託的天地。在大多數訪談的個案中，會發現他們對台灣現代社會的嚮往，並不因為經歷過的種種挫折而所有褪色。在長遠的社會變遷衝擊下，這個孤立小島的少數族群——尤其是他們的年輕世代的「世界觀」，已經不由分說地悄悄轉變。他們理想中的自我實現方式、生命價值的寄託、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等形成認同的核心，已經朝著現代性所影響的方向移動。然而少數族群身分、不利的社會位置、文化傳統等因素，使他們不斷深陷於理想與現實雙重束縛的困境。

達悟人做為孤立小島上的少數族群，面對台灣本島與漢人社會，原本即處於政治、社會、文化等的邊緣弱勢位置。在無可逃避地進入現代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中，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難以享受現代性可能帶來的美好生活，反而經常充滿進退失據的困窘與挫折。蘭嶼達悟人獨特的高比例精神失序現象，反映了他們在快速社會變遷下的集體失序。從一個更宏觀的角度來看，我們也許可以說，當代達悟人承受的高比例精神失序的苦痛，是長遠的現代性發展席捲世界，而對原本就處於不利地位的少數族群所造成的更不利後果。我們可以說，基因研究取徑顯然把涉及原住民疾病受苦的問題，以相當窄化的方式來理解。即使這種理解方式不完全錯誤，對於關注原住民健康議題的

## 研究者，也必須尋求適當的超越。

誌謝：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2005 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感謝評論人吳齊殷教授與在場諸君的寶貴建議。特別感謝張苙雲、張茂柱、吳嘉苓諸位教授的討論與鼓勵。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相當有建設性的修改建議，以及前後任主編謝國雄、謝雨生教授與編委會對筆者的指正。特別是謝國雄教授細心對本文理論、方法、資料分析詮釋等提出長達三頁的精闢建議，使筆者獲益良多。編輯謝麗玲小姐相當專業的叮嚀，謹此致謝。衷心感謝這些年來達悟朋友對我的溫暖接納與支持，特別是 Syapen Kazyaz 一家人。我多次來往蘭嶼，總是在他們家自由穿梭。他們全家待我如同親人，無條件提供我一切所需。感謝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獎助提供本研究部分田野經費與極佳的工作環境。也感謝哈佛醫學院社會醫學系在我訪問期間所給予本文研究上的啟發。文中內容若有疏漏，概由筆者負責。

## 附錄 個案資料表 (截至 2006 年為止)

| 化名     | 性別 | 婚姻 | 首度來台年齡 | 目前年齡 | 發病年齡 | 診斷             | 教育程度  | 開始出現異常行為的地點 |  | 住院次數 |
|--------|----|----|--------|------|------|----------------|-------|-------------|--|------|
| 01 陳海成 | 男  | 未婚 | 13     | 48   | 20   | 精神分裂症          | 小學    | 台灣          | 隻身在台灣工作時，出現自殺、自殘行為。  | 7    |
| 02 陳海妹 | 女  | 已婚 | 20     | 46   | 13   | 雙極性情感精神疾病      | 國小二年級 | 蘭嶼          | 國小五年級被鄰居用矛嚇到後出現不正常行為(例如：隨便跑到別人家睡、當眾脫衣)。                            | 1    |
| 03 趙懷光 | 男  | 未婚 | 18     | 20   | 16   | 雙極性情感精神疾病(躁鬱症) | 高職    | 蘭嶼          | 母親因破壞警局被勒令進入台灣精神病院兩年。母親住院時他開始出現不停走動、幻聽、傻笑、喊死去人的名字。                 | 2    |
| 04 白志鴻 | 男  | 未婚 | 15     | 40   | 31   | 精神分裂症          | 國中    | 台灣          | 在台灣工作時出現怪異行為，當時弟弟因改建家屋從屋頂摔下成為植物人。                                  | 1    |
| 05 白志明 | 男  | 未婚 | 16     | 35   | 23   | 器質性精神疾病        | 國中    | 蘭嶼          | 家屋改建時從屋頂摔下，嚴重腦傷。   | 1    |
| 06 陳灣地 | 男  | 已婚 | 14     | 54   | 42   | 精神分裂症          | 小學    | 蘭嶼          | 八〇年代台灣板模業看好，在太太懷第七個孩子時，到台工作。一個月後返回蘭嶼開始出現害怕、在部落中隨意遊蕩、自言自語、幻聽、幻覺等症狀。 | 0    |
| 07 陳安安 | 男  | 未婚 | 16     | 28   | 18   | 精神分裂症          | 國中    | 台灣          | 在台灣工作時出現幻聽、極度恐懼等症狀。  | 8    |
| 08 呂國輝 | 男  | 未婚 | 16     | 44   | 33   | 精神分裂症          | 國中    | 台灣          | 大哥自殺後，在台工作時出現幻聽，並用玻璃切腹自殺。  | 1    |
| 09 呂阿安 | 男  | 未婚 | 17     | 41   | 31   | 精神分裂症          | 國小三年級 | 蘭嶼          | 在遠洋漁船工作後，回蘭嶼長期失業，整天在部落遊盪後漸漸出現異常行為。                                 | 2    |
| 10 呂健永 | 男  | 已婚 | 16     | 38   | 35   | 憂鬱症，但未收案       | 大專    | 蘭嶼          | 經歷家中大哥自殺，二哥、三哥精神失序，在母親過世一年後，出現幻聽、憂鬱等症狀。                            | 0    |
| 11 鄭齊國 | 男  | 未婚 | 18     | 27   | 22   | 精神分裂症          | 高中    | 台灣          | 父母離異，在台工作時，出現幻聽、半夜隨意走動。  | 2    |
| 12 鄭齊利 | 男  | 未婚 | 18     | 25   | 18   | 精神分裂症          | 高中    | 蘭嶼          | 哥哥在台發病返家後，受哥哥不正常行為打擊，開始出現自言自語、跑到墓地等異常行為。                           | 1    |

|             |   |    |    |    |         |                |       |    |  |      |
|-------------|---|----|----|----|---------|----------------|-------|----|--|------|
| 13Si-Yi     | 男 | 未婚 | 18 | 43 | 21      | 精神分裂症          | 國中    | 台灣 | 在台工作時出現異常徵兆。   | 長期住院 |
| 14Sinan-She | 女 | 已婚 | 13 | 40 | 13      | 精神分裂症          | 國中    | 台灣 | 國小六年級到台灣打工，疑似被賣入妓女戶，回蘭嶼後逐漸行為異常。                                    | 長期住院 |
| 15 真翎       | 女 | 同居 | 17 | 32 | 28      | 情感性精神疾病        | 國中    | 蘭嶼 | 在台灣出現悶、幻聽、消瘦，自己覺得不對勁跑回蘭嶼。  | 1    |
| 16 林茵       | 女 | 未婚 | 18 | 33 | 23      | 雙極性情感精神疾病      | 高職    | 台灣 | 在台鞋店工作時，出現悶、幻聽。  | 5    |
| 17 家進       | 男 | 未婚 | 17 | 43 | 20      | 精神分裂症          | 國中    | 台灣 | 在台工廠工作時，出現幻聽、行為異常。   | 2    |
| 18 莊慧珊      | 女 | 未婚 | 17 | 32 | 27      | 精神分裂症          | 高職    | 台灣 | 在台北工作時，出現害怕、幻聽、行為異常。   | 2    |
| 19 吳談       | 男 | 已婚 | 18 | 51 | 31      | 精神分裂症、酗酒       | 高職    | 蘭嶼 | 從台灣返回蘭嶼後長期失業，開始出現幻聽、自殘等行為。   | 2    |
| 20 于順發      | 男 | 已婚 | 20 | 53 | 約 40 多歲 | 器質性精神疾病        | 小學    | 蘭嶼 | 車禍後失業，太太在台灣打工，開始出現一直把垃圾撿回家的行為。                                     | 1    |
| 21 李強       | 男 | 未婚 | 18 | 38 | 約 30    | 酗酒、精神分裂症       | 小學    | 台灣 | 在台灣工作時出現幻覺、幻聽。   | 未知   |
| 22 春菊       | 女 | 已婚 | 20 | 42 | 約 30    | 精神分裂症          | 國中    | 台灣 | 嫁給漢人，婚後先生常毆打她。先生死後回蘭嶼開始行為異常。                                       | 0    |
| 23Sypan-Da  | 男 | 未婚 |    | 已歿 | 約 60 多歲 | 精神分裂症與妄想症      | 日本教育  | 蘭嶼 | 在蘭嶼出現妄想、打老婆、拿斧頭砍電線杆等行為，強制送入台灣的精神病院後，於 2004 年歿於醫院。                  | 1    |
| 24 尤家東      | 男 | 未婚 | 18 | 46 | 26      | 精神分裂症、酗酒       | 國小二年級 | 蘭嶼 | 在台於工廠工作時，左手手指被切斷三指，因此無法繼續工作。失業後回蘭嶼因長期失業，出現幻聽、酒後大吵大鬧等行為，父親過世後症狀變嚴重。 | 3    |
| 25 黃耀敬      | 男 | 未婚 | 13 | 47 | 30 多歲   | 酗酒、精神分裂症       | 小學    | 蘭嶼 | 由台灣工作返回蘭嶼後，逐漸出現幻覺、害怕、傻笑、自言自語等行為。                                   | 2    |
| 26 黃叮峰      | 男 | 已婚 | 18 | 46 | 30 多歲   | 精神分裂症          | 國中    | 台灣 | 在台工作時出現胡言亂語、傻笑、妄想自己是耶穌。  | 2    |
| 27 黃恆雲      | 女 | 已婚 | 18 | 43 | 37      | 雙極性情感精神疾病(躁鬱症) | 高中肄業  | 台灣 | 害怕、幻聽、幻覺。  | 0    |

|    |          |   |    |       |    |            |                |        |    |  |      |
|----|----------|---|----|-------|----|------------|----------------|--------|----|--|------|
| 28 | 橫平       | 男 | 未婚 | 18    | 45 | 約 30<br>多歲 | 精神分裂症          | 國中     | 台灣 | 失業又酗酒後，開始出現幻聽、幻覺、亂罵人等行為。                         | 0    |
| 29 | 林東茂      | 男 | 未婚 | 18    | 34 | 24         | 情感性精神疾病        | 專科肄    | 台灣 | 專科念到一半時，因與家人賭氣而休學。回蘭嶼後便常在部落出現大聲喊叫、故意破壞鄰居物品等異常行為。 | 3    |
| 30 | 陳士楠      | 男 | 未婚 | 14    | 47 | 約 35       | 精神分裂症          | 小學三年級肄 | 台灣 | 從台灣工作回來後，出現妄想、攻擊行為。                              | 3    |
| 31 | 陳水龍      | 男 | 已婚 | 未曾來台灣 | 42 | 未知         | 癲癇合併早發型痴呆      | 小學     | 蘭嶼 | 不斷戴東西在手上的強迫行為。                                   | 未知   |
| 32 | Sypan-Ta | 男 | 喪偶 | 30    | 80 | 58         | 精神分裂症          | 日本教育   | 蘭嶼 | 太太過世，兒子遷居台灣，獨居後開始行為異常。                           | 0    |
| 33 | 楊洋       | 男 | 未婚 | 17    | 34 | 28         | 精神分裂症          | 國中     | 台灣 | 在台工作時會睡不著，出現幻聽與喝酒後大吼大叫等行為。                       | 0    |
| 34 | 游珠珠      | 女 | 未婚 | 17    | 21 | 15         | 憂鬱症            | 大專     | 蘭嶼 | 媽媽覺得她國二時個性大變，並在日記簿上寫著想自殺。                        | 0    |
| 35 | 曾玲如      | 女 | 已婚 |       | 48 | 約 35       | 精神分裂症          | 小學     | 蘭嶼 | 出現幻聽、打人等行為，認為家裡是佈道場，並會把家中東西送給人。                  | 2    |
| 36 | 國玄       | 男 | 未婚 | 17    | 24 | 20         | 未納入精神科，採宗教治療   | 高中     | 蘭嶼 | 在蘭嶼擔任社區總體營造工作時，工作壓力太大，出現嚴重幻聽、吵鬧、自言自語等行為。         | 0    |
| 37 | 衫明       | 男 | 未婚 | 13    | 24 | 21         | 憂鬱症            | 大學肄    | 台灣 | 讀大一時出現幻聽、極度害怕、失眠等症狀，因而休學回蘭嶼。                     | 0    |
| 38 | 賴金鳳      | 女 | 離婚 | 18    | 42 | 33         | 憂鬱症            | 國中     | 台灣 | 先生喝酒後常毆打她，與先生離婚後，來台找不到工作，開始幻聽、拿聖經不斷跪拜等異常行為。      | 2    |
| 39 | 小靈       | 女 | 未婚 | 16    | 29 | 18         | 雙極性情感精神疾病(躁鬱症) | 高職     | 台灣 | 高二時父親過世，在台讀書時出現害怕、情緒激動無法自我控制等異常行為。               | 9    |
| 40 | 鄭自時      | 男 | 離婚 | 17    | 37 | 30         | 未知             | 國中     | 蘭嶼 | 在台車禍後長期失業，加上太太要求離婚，離婚後開始出現大量酗酒、大吼大叫與毆打父母等行為。     | 長期住院 |
| 41 | 林仁清      | 男 | 未婚 | 17    | 37 | 24         | 精神分裂症          | 國中     | 台灣 | 在台工作時，出現不斷走來走去的異常行為。                             | 0    |
| 42 | 周大官      | 男 | 未婚 | 16    | 46 | 24         | 精神分裂症          | 國中     | 台灣 | 幻聽、生活作息改變。                                       | 0    |

|    |          |   |    |    |    |      |                   |    |    |  |   |
|----|----------|---|----|----|----|------|-------------------|----|----|--|---|
| 43 | 周大市      | 男 | 未婚 | 16 | 32 | 29   | 精神分裂症             | 國中 | 蘭嶼 | 喝酒後大吵大鬧。   | 2 |
| 44 | 小柔       | 女 | 未婚 | 17 | 25 | 22   | 精神分裂症             | 高中 | 台灣 | 原先做電子業後轉行餐飲業，被廚師無故解雇。加上男友離去後感情受創，開始出現幻聽、幻覺、自殘行為。   | 1 |
| 45 | 林山       | 男 | 未婚 | 17 | 48 | 25   | 精神分裂症             | 國中 | 蘭嶼 | 國中畢業後，到台灣工作，因工廠倒閉回鄉。長期失業後出現向鄰居丟石頭、破壞家中用具等行為。       | 1 |
| 46 | 維凱       | 男 | 未婚 | 17 | 42 | 26   | 精神分裂症             | 國中 | 台灣 | 在高雄工作時曾被人追打，醒來後躺在甘蔗園。之後回鄉便出現害怕、疑心病重、情緒不穩。          | 3 |
| 47 | 江家力      | 男 | 已婚 | 16 | 35 | 24   | 酗酒、精神分裂症          | 國中 | 蘭嶼 | 長期失業在蘭嶼後出現異常行為。                                    | 1 |
| 48 | 黃樂獅      | 男 | 未婚 | 14 | 59 | 未知   | 酗酒、雙極性情感精神疾病(躁鬱症) | 小學 | 蘭嶼 | 發作時會不停說話、拿紙不斷寫東西、打人。                               | 0 |
| 49 | Sypan-Wu | 男 | 已婚 |    | 78 | 60多歲 | 妄想症               | 無  | 蘭嶼 | 原為巫醫，目前嚴重喪失生活自理能力，出現幻聽、自言自語。                       | 0 |
| 50 | 姚勤       | 男 | 未婚 | 16 | 39 | 39   | 未知                | 國中 | 蘭嶼 | 失業多年，出現幻聽、自言自語，2005年哥哥癌症去世，2006年因打破鄰居玻璃，而被送入醫院精神科。 | 1 |
| 51 | 吳立琴      | 女 | 已婚 | 18 | 39 | 38   | 憂鬱症               | 高中 | 台灣 | 被調到台灣工作，一人帶著孩子，與先生分離兩地，出現情緒不穩、行為嚴重失控。              | 1 |

## 參考文獻

- 王人英(1967)台灣高山族的人口變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之十一。  
台東縣政統計 <http://www.taitung.gov.tw/department/m1/1416.htm>
-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1989)蘭嶼地區社會發展與國家公園計畫。台北：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7)《高砂族調查書》，第四篇總括，昭和十一年。台北。
-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1998)台灣原住民生活狀況調查報告，頁 136-137，表 13。
- (1999)民國八十八年台灣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
- (2001)民國九十年下半年台灣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
- (2001)民國九十年上半年台灣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
- (2002)民國九十一年台灣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
- 余光弘(1994)雅美人食物的分類及其社會文化意義。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集刊 76: 21-42。
- 余光弘、董森永(1998)台灣原住民史：雅美族史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吳玉琴(1992)台灣原住民生涯發展模式——以雅美都市移民為對象。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豪哲(1988)阿美山胞城鄉遷移與生活適應之研究。台北：台灣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亦園(1960)Anito的社會功能：雅美族靈魂信仰的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10: 41-55。
- (1978)都市中高山族的現代化適應。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第二輯，頁 717-739。台北：中央研究院。
- (1979)社會文化變遷中的臺灣高山族青少年問題：五個村落的初步比較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48: 1-29。
- 李亦園、王俊秀、余光弘、鄭先祐、關華山(1990)科技文明對蘭嶼雅美文化衝擊之文化生態學研究。未出版。
- 林金泡(1981)台灣北部地區的都市山胞。中國論壇 12(7): 24-28。
- (1996)原住民的都市情境。人類與文化 31: 178-184。
- 林信男、劉絮愷(2002)精神醫學史。見李明濱主編，實用精神醫學，頁 13-18。台北：台灣大學醫學院。
- 林憲(1978)精神醫學與社會。台北：當代醫學雜誌社。
- (1996)社會、文化精神醫學：林憲教授退休紀念論文選。台北：台灣大學。

- 姚克明(1982)雅美人與健康有關的生活方式及其特異的衛生觀念與行為調查研究。  
台北：台灣省公共衛生研究所。
- 柯志明(1993)台灣都市小型製造業的創業、經營與生產組織：以五分埔成衣製造業為案例的分析。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紀駿傑(1997)環境殖民：資本主義生產擴張下的台灣原住民土地與資源權。1997年9月20日原住民土地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國土地經濟學會主辦。
- 美國人類學會(2007) <http://www.aaanet.org/stmts/racepp.htm>。下載時間：2007年5月16日。
- 胡海國(1995)泰雅族飲酒問題的分子遺傳學研究。計畫編號：NSC 86-2314-B002-291，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2002)精神疾病之診斷與分類。見李明濱主編，實用精神醫學，頁71-82。台北：台灣大學醫學院。
- 夏曉鵬(2000)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北：台灣社會研究社。
- 夏鑄九、陳志梧(1988)台灣的經濟發展，蘭嶼的社會結構與國家公園的空間角色。見夏鑄九編，空間、歷史與社會論文集 1987-1992，頁233-246。台北：台灣社會研究社。
- 張和平、楊寬弘、陳明招、游步雲(1993)澎湖地區精神醫療概況。離島精神醫學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民國精神醫學會主辦。
- 張荳雲(1988)台灣地區山地鄉居民健康狀況及醫療需求調查研究計畫第一年報告。台北：行政院衛生署。
- (1989)台灣地區山地鄉居民健康狀況及醫療需求調查研究計畫第二年報告。台北：行政院衛生署。
- 張曉春(1974)台北地區山地移民適應初步調查研究(上)、(下)。思與言 11(6): 1-21, 12(1): 30-37。
- 張興傑(1998)國家權力下的達悟(Tao)家屋重構。台北：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木柱、鄭泰安(1991)社會文化因素與輕型精神症狀——泰雅與阿美兩族比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71: 133-160。
- 陳玉美(1995)夫妻、家屋、聚落。見黃應貴主編，空間、力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陳叔倬(2000)原住民人體基因研究之倫理爭議與立法保護。生物科技與法律研究通訊 8: 7-29。
- 陳長謙(2001)基因體醫學國家型科技計畫規劃報告。

- 陳國鈞(1955)蘭嶼雅美族。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 傅仰止(2001)都市原住民概說。見蔡明哲、傅仰止著，台灣原住民史——都市原住民史篇。南投：台灣省文獻會。
- 黃雅惠(1990)蘭嶼反核廢場運動之動員過程分析。新竹：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應貴(1975)台灣高山族的經濟變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40: 85-95。  
——(1981)柬埔寨土地制度之演變：一個台灣中部布農族聚落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52: 115-149。
- 楊政賢(1998)蘭嶼東清部落「黃昏市場」現象之探討：貨幣、市場與社會文化變遷。花蓮：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葛應欽(1998)原住民健康研究：重要疾病遺傳／分子流行病學。行政院衛生署八十八年度整合性醫藥衛生科技研究計畫，計畫編號：DOH88-HR-803，高雄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科執行。
- (2001)達悟族原住民精神分裂之基因連鎖分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NSC 89-2314-B-037-112，高雄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科執行。
- (2004)台灣原住民痛風之遺傳連鎖分析：手足配對連鎖分析及合併傳遞連鎖不平衡檢定研究。國家衛生研究院電子報第 38 期，2004 年 3 月 26 日刊載。  
<http://www.nhri.org.tw/nhri6/enews.php>。
- 葛應欽、楊美賞、蔡麗玉、章順仁、蔡世盟、王姿乃、張家禎、黃孟娟(2001)台灣原住民高血壓及其相關疾病之研究。葛應欽計畫主持，行政院衛生署九十年科技研究發展計畫，計畫編號：DOH90-MD-MI9002，高雄醫學大學執行。  
台北：行政院衛生署。
- 董恩慈(2004)蘭嶼就業問題之探討。[http://www.pct.org.tw/rnd/tao/Tao4\\_5.htm](http://www.pct.org.tw/rnd/tao/Tao4_5.htm)。
- 趙彥寧(2004)公民身分、現代國家與親密生活：以老單身榮民與「大陸新娘」的婚姻為研究案例。台灣社會學 8: 1-41。
- 鄭泰安(1997)台灣地區漢族與原住民酒癮之遺傳基因研究。計畫編號：NSC 87-2314-B001-030，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劉文健、楊聰財、陳震宇(1993)金門地區精神病患調查及資源評估報告。離島精神醫學研討會論文集。
- 劉珣瑛、莊上平、高正治(1993)蘭嶼精神醫療狀況。離島精神醫學研討會論文集。
- 蔡友月(2006a)社會變遷下的蘭嶼達悟人精神失序之分析——現代醫療、文化建構、與受苦的社會根源。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2006b)原住民社會與不正常的人：達悟傳統、基督宗教、現代醫療。2006 年

- 4月28日第三屆台灣本土心理治療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台灣心理治療學會、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協辦。
- 蔡明哲、傅仰止(2001)台灣原住民史——都市原住民史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蔡筱君(1997)達悟(Tao)人家屋空間之社會生產。台北：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衛惠林、劉斌雄(1962)雅美族的社會組織。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盧幸娟(2001)發展中的台灣原住民自治——以蘭嶼達悟族為例。花蓮：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 鮑克蘭(de Beauclair, Inez)(1959)蘭嶼雅美族的財富誇示禮物交換與禮食分配(摘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8: 185-210。
- 聯合報(1995)讓雅美人回家系列報導五之一，誰偷了他們的靈魂。6月5日。
- 藍佩嘉(2002)跨越國際的生命地圖：菲籍家務移工的三角關係。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48: 169-218。
- 謝永泉(2004)傳統達悟神觀與基督宗教神觀的比較。當達悟遇到基督——天主教傳入藍嶼五十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輔仁大學原住民服務中心主辦。
- 顏婉娟(2000)烏來泰雅族婦女飲酒經驗之探討。台北：陽明大學社區護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Al-Issa, Ihsan, and Michel Tousignant (1997) *Ethnicity, Immigration, and Psychopathology*. New York: Plenum Press.
- Almeida-Filho Nd. (1987) Social Epidemiology of Mental Disorders: A Review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75: 1-10.
- Cheng, T. A., and Hsu M. (1992) A Community Study of Mental Disorders among Four Aboriginal Groups in Taiwan.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2: 255-263.
- Cockerham, William C. (1992) *Medical Sociology*, 5th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Cohen, Alex (1999) *The Mental Health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 International Overview*.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Conard, Peter (2001) Genetic Optimism: Framing Gene and Mental Illness in the News.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25: 225-247.
- Davison, Gerald C., and John M. Neale (2000) *Abnormal Psychology*, 8th ed. New York: Wiley & Son.
- Desjarlais, Robert, Leon Eisenberg, Byron Good, and Arthur Kleinman (1995) *Worl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nd Priorities in Low-Income Countries*. New York: Oxford

- University Press.
- Glaser, Barney G., and Anselm L. Strauss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New York: Aldine.
- Kitano, Harry H. L. (1969) Japanese-American Mental Illness. Pp. 257-248 in *Changing Perspectives in Mental Illness*, edited by S. C. Plog and R. B. Edgert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Kleinman, Arthur (1988) *Rethinking Psychiatry: From Cultural Category to Personal Experien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1995) Pitch, Picture, Power: The Globalization of Local Suffering, Subjectivity, and the Remaking of Human Experience in a Disordering World.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90(3): 315-335.
- (1999) Experience and Its Moral Modes: Culture, Human Conditions, and Disorder. Pp. 357-420 in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 edited by Peterson Grethe B..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 Kleinman, Arthur, and Joan Kleinman (1991) Suffering and Its Professional Transformation: Toward an Ethnography of Experience.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15(3): 275-301.
- Kleinman, Arthur, Veena Das, and Margaret Lock, eds. (1997) *Social Suffer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ncoln C. Chen, Arthur Kleinman, and Norma C. Ware, eds. (1994) *Health and Social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ittlefield, A., L. Lieberman, and L. Renolds (1982) Redefining Race: The Potential Demise of a Concept in Physical Anthrop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23(6): 641-656.
- Lewontin, Richard C., Steven P. R. Rose, and Leon J. Kamin (1984) *Not in Our Genes: Biology, Ideology and Human Natur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Morrison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Resource Studies (1999) *Human Genome Diversity Projec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http://www.stanford.edu/group/morrinst/hgdp/faq.html#Q7>. Retrieved June 20, 2000.
- Park, Rober E. (1928)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3(6): 881-893.
- Portes, Alejandro, and Ruben G. Rumbant (1996) *Immigrant America: A Portrai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ortes, Alejandro, and Robert D. Manning (1984) The Immigrant Enclave: Theory and

- Empirical Examples. Pp.47-66 in *Competitive Ethnic Relations*, edited by Susan Olzak and Joane Nage. New York: Academic Pree.
- Poudrier, Jennifer D. (2004) *Decolonization Genetic Science: The Thrifty Gene Theory, Aboriginal Health and Empowering Knowledge*. Ph. D. dissertation. Kingston, Ontario: Queen's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Stonequist, Everett V. (1937) *The Marginal Man: A Study in Personality and Culture Conflict*.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 Saggers, Sherry, and Dennis Gray (1991) *Aboriginal Health & Society: The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Aboriginal Struggle for Better Health*. Australia: Allen & Unwin.
- O'Neill, Theresa DeLeane (1996) *Disciplined Hearts: History, Identity, and Depression in an American Indian Commu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Vakhtin, Nikolai (1992) *Native Peoples of the Russian Far North.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Report*. London: Minority Rights Group.
- Wilson, Kenneth, and Allen W. Martin (1978) Ethnic Enclaves: A Comparison of the Cuban and Black Economics in Miami.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8: 135-160.

## 在跨界中尋求知識的可能性與定位

蔡友月

我的博士論文共有九章，這篇研究論文改寫自其中一章。也就是說，這篇論文所呈現達悟人普遍經歷的結構性困境，僅是整個故事的一小部分。我的博士論文試圖從社會變遷的歷史視野來回答：「精神病是什麼？」理論的對話主要環繞在此核心問題。博士論文的具體分析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探索達悟人高比率精神失序的歷史社會根源，包括遷移、家屋改建、家庭功能解組、失業、酗酒、自我認同混亂等面向，藉此反省台灣九〇年代之後從基因角度研究原住民健康的盲點。第二部分探討現今交錯影響達悟人精神失序的三個典範，亦即達悟傳統、基督宗教與現代精神醫療，並且分析不同世代達悟人所面對不同階段的社會變遷與世界觀的轉換，如何形塑其相異的疾病經驗。不過在這篇研究論文，我把原先所關注「精神病是什麼？」這樣一個較高層次的問題，重新聚焦在「遷移、挫折與精神失序」彼此的關係上。在尋找理論對話對象的過程中，我發覺一個本地社會的重要現象，往往未必是以歐美為主的國際學術社群理論關注的焦點。對我而言，這樣的緊張是珍貴的養分，形塑了我發問的起點、回答問題的方式、以及研究的某種基調。

從問題意識的浮現到決定進入田野，離開自己所熟悉的環境，到離島的原住民部落從事一個對我而言是高難度的民族誌研究，融合了我從護理訓練、醫院臨床工作、媒體編輯到學習社會學一路以來的探索與追尋。我的碩士論文研究癌末病人，探討現代人垂死歷程「醫療化」所產生的種種問題，指出醫院科層化組織制度與科技理性運作方式，在面對現代人的死亡時都有一定的限制。這樣的結論刺激我進一步思考：我們能不能從歷史、社會文化面找到可以幫助我們面對生、老、病、死的其他力量？2000年擔任報社醫療版的編輯時，我注意到達悟人高比率精神失序的特殊現象，同時決定以解答心中的問號做為重回學院努力的方向。在找尋答案的這些年，我開始經歷幾個不同面向的跨界所帶來的衝撞：一、地理的：蘭嶼、台灣、美國；二、族群的：原住民、漢人、美國人；三、社會型態的：傳統、現代、高度現代性；四、現代社會規範的：正常人、不正常人；五、知識的：醫學、社會學。身處這些跨界的拉扯中，我不斷思考自身知識的可能性與定位，並由此萌生出路。

我到蘭嶼的第一個夜晚，部落的朋友把我安置在牧師家。那幾天，牧師的兒子衫明正從高中放寒假返鄉，他熱心地帶我爬屋頂看海，高興地彈著吉他，和我分享在高中演唱會所唱的歌曲。我怎麼也沒有料到，兩年後再度拜訪，牧師告訴我：「我的孩子也變成你的研究個案了，他

現在已經從大學休學回家了。妳要不要和他聊一聊？」我不知道那些原本只被我當成研究假設的命題，一旦活生生在我的眼前被驗證時，我的社會學知識追求本身的意義何在，而社會學知識要如何幫我釐清這些荒誕背後所彰顯的意義。

我也永遠忘不了陳安安第四次出院那天，在他家僅有四、五坪大的簡陋鐵皮屋中的一段景象。僅有國中畢業程度、沒有任何電腦相關技能、家人明白表示根本沒有碰過電腦的他，卻一臉認真地告訴我：「我未來的工作目標，是要到台灣做網際網路。」在這個遠離台灣社會、與世界的核心相隔渺遠的小島上，許多人、許多畫面就像安安認真的表情一樣，慢慢地烙印在我腦海，久久無法離去。

然後帶著這些印記，我飛向另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2004-2005年我獲得公費獎學金，到美國參與一個「跨文化精神醫學」的研究計畫，接受為期一年的上課與訓練。臨走前我對著一位達悟的好朋友說：「回來後或許會比較能夠體驗你們遷移台灣的辛苦。」後來，我才明白這是自己的大話。支撐我到美國深造的機會結構，遠超出大多數遷移台灣工作或求學的達悟孩子所擁有的。我既接受美國生活的全新刺激，也開始下意識的比較蘭嶼與它們的不同。這樣的經驗有點類似長期在海地進行田野研究，同時兼具哈佛教學醫院醫師與人類學家的 Paul Farmer 的體驗。他說往返於肯吉（海地）和波士頓的旅途，總令他心情起伏不定。一邊是嚴重營養不良，另一邊卻是衣著光鮮者大談減肥之道。擺盪在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促使我去問更深刻的信仰問題。Farmer 說得好：在一個表面上無神論、崇拜金錢與權力、講求個人效率和升遷的世界，上帝的存在仍然有跡可尋，可以從窮人所受的苦難去尋找。在這段學習歷程中，我幸運地經歷到神的帶領，並從中領悟到：不管是現代醫學或社會學，或者其他的知識與實作，在舒緩解決人類的受苦與創傷上，都有一定的局限，因此應有謙虛與自制，才不會導致特定知識或世界觀衍生的權力濫用，轉而製造人們的另一種受苦與創傷而不自知。

在論文寫完之際，一些田野中受訪者的年輕生命有如流星，以極快的速度隕落。原住民平均餘命遠低於漢人、意外事故頻繁、死亡率集中在青壯人口等健康報告中的統計，活生生的不斷展現在我所見所聞的那些受訪者身上。在田野中，我逐漸發現，探究目前在蘭嶼島上任何一位達悟人的"zipos"親族網絡，一定可以找到自殺、酗酒、發瘋、意外死亡的成員，無人能夠倖免。經過長期的社會學角度的觀察與探討，我相信達悟人青壯世代高比率的精神失序，那些田野中不斷遇見的身心創傷，不是偶遇的、隨機的，而是一個少數族群集體性的宿命，是與族群身分、地理位置、文化傳統等有關的社會不平等結構位置帶來的多重受苦。我期望這些研究發現，有助於尋找對症下藥的處方。

